

【一般論文】

「RIP, 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 學位生」的國族經驗*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可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RIP, 426”: Analyzing “National Experiences” of the
Degree-Pursuing Mainland Students in Taiwan

by

Hornng-Luen W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hlwang@gate.sinica.edu.tw

Ke Z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00341011@ntu.edu.tw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劃「尋找（東亞）和解共生的契機：探討超越國族現實的可能性」(MOST 103-2410-H-001-100-MY3) 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所有曾經接受訪談與提供協助的陸生受訪者；沒有他／她們的貢獻，本文無法完成。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的意見使本文的論證更加完整，在此一併申謝。

收稿日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摘要

2011年，台灣正式開放「大陸地區學生」(簡稱「陸生」)來台求取高等教育學位，為兩岸交流注入新元素。許多政府高層與民間支持者都樂觀認為，開放陸生來台可增進兩岸年輕世代的相互理解，甚至可以培養未來大陸的「親台派」，有助於和緩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和平。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從制度、認識框架與情感結構三個層次來解析陸生來台之後在「國族問題」上所感受的經驗，發現陸生的國族經驗產生「推力」與「拉力」，分化出三種不同類型的陸生，其中兩類對台灣的反感或敵意增加，對中共現行體制的認同度則上升。這樣的結果，與原先開放陸生來台的政策預期似乎有所抵觸。本文最後則根據上述分析，提出本研究對和平與和解的啟示。

關鍵詞：陸生、凡常民族主義、日常生活、兩岸關係、現象學的社會學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台灣是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¹

2016年4月26日，一個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子，一位在台灣求學的大陸地區學生（以下簡稱「陸生」²）在臉書上面貼了一張圖，圖中是一輛機車的尾部特寫，車牌號碼是「RIP-426」，上方的貼文僅有短短一句：「作為426，426這天需要來份鴨腿飯壓壓驚……。」（參見圖1）

這則貼文帶有強烈的諧謔意涵。照片中的RIP是拉丁文“Requiescat in pace”的縮寫，翻成英文為“Rest in peace”，意謂「安息吧」，而「426」則是部分台灣人對大陸人的蔑稱，是台語「死阿陸」的數字諧音。因此，



圖1 「RIP, 426」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資料。

¹ 如本文所將指出的，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包括「中國」、「大陸」等詞彙，在本文所欲分析的國族問題中，都不是中性的詞彙，在不同的脈絡中可能隱含不同的意圖或政治立場。例如有些媒體刻意不用「陸生」而用「中生」，甚至在採訪時把受訪者口中的「大陸」自動改為「中國」。本文在不預設立場的前提下，盡可能以貼近分析脈絡的方式（如採用受訪者能接受的用語、或是一般約定俗成的用法），交雜使用「中國」、「大陸」或「中國大陸」等詞彙。

² 「大陸地區學生」是台灣官方的正式用語，一般則俗稱「陸生」。嚴格來說，「陸生」同時包含「學位生」與「交換生」，後者並未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中註冊，僅僅是以交換學生的身分短期來台。下面的分析將會提到，學位生與交換生在台灣的經驗十分不同，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為了指稱方便，本文的「陸生」僅限指學位生，至於以交換學生身分短期來台的大陸地區學生，則以「交換生」稱之，以示區別。

「RIP-426」可以解讀為「安息吧，死阿陸」甚或「安息吧，你們這些該死的大陸人」。這張照片如果是由一位嫌惡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所貼出，那麼意思十分顯明，就如同「RIP-426」的字面意思一樣。然而，如果這張照片是由一位陸生貼出，意義就完全不同，十分耐人尋味。陸生在台灣人較常使用的臉書（而不是陸生圈子常用的微信）上自稱「426」，就好比台灣人自稱「台巴子」或美國黑人自稱“nigger”，無異於自我歧視。然而，把別人對自己的蔑稱拿來往自己身上套（大陸網民稱為「自黑」），除了有明顯的嘲諷意圖外，恰恰是要為自己解套，隱含的意思是說：看吧！連我都可以這麼自稱了，那麼你們將來再如何用這種蔑稱來侮辱我，對我也無法造成任何傷害，因為我已經完全不在乎了。而「RIP」，則是進一步將這種「我心已死」的心境，表露無遺。對大部分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4月26日這天平淡無奇，很少人會在意這一天是什麼日子；然而，這位陸生選在這天貼出這張照片，加上上述的按語，很顯然地，「426」是一個很讓他在意的數字，而他特地記得這一天，貼出這麼一張照片來表達心境，甚至說「426 這天需要來份鴨腿飯壓壓驚」。究竟陸生在台灣受了什麼「驚」，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心境？為何陸生一方面戲稱自己是「426」，一方面卻又透露著「我心已死」的沉痛心境？

2011年，在馬英九政府擴大兩岸交流的背景下，首批來自大陸地區的學位生在台灣開始他們的求學生涯。這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能夠長期在台灣的大學中求取學位。³ 開放陸生來台求學，主要的背景有二：其一，是為了解決台灣日益惡化的高等教育危機。由於少子化的趨勢嚴重，許多大專院校面臨招生不

³ 在學位生之前，已經有交換生來台短期就學（通常為一個學期）。關於學位生與交換生的差異，參見註腳2。

足的問題，開放陸生來台求取學位，可以增加生源，緩解招生不足的困境。其二，則是在擴大交流的前提下，希望藉由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可以增進兩岸相互理解，甚至培養未來的「親台派」，和緩一度緊張的兩岸關係。在「陸生三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行政院發出新聞稿，認為開放陸生來台將可促進兩岸良性交流，「讓兩岸學子認識台灣民主開放的價值，展現教育與文化的柔性國力，亦將為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啟嶄新的一頁」。⁴ 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更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讓更多兩岸年輕人交流，將來雙方達到和平解決爭端的機會就會更大；「台灣開放自由的環境，絕對有助於兩岸和平」，因為「這些人將來回到大陸後，可以變成台灣最好的朋友」（李淑華，2011；李明賢，2011）。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宣示與政府高層的樂觀期待外，民間也有不少支持者認為陸生來台可增進彼此理解，化解衝突，招收陸生是台灣自信的體現，也是兩岸和平的具體見證。一些經常在報刊撰文的學者專家與政府官員認為，開放陸生來台將可讓雙方的學生學習到包容差異，交流彼此現代化的經驗，為兩岸永續和平奠定基礎（楊景堯，2015，頁 37-51；黃碧端，2013；黃光國，2012）；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台灣學者葉家興甚至將 2011 年定位為「陸生元年」，認為這是台灣走向開放，打造「亞洲華人大聯盟」的契機，而兩岸之間的緊張與敵意，也可透過更多的交流而得到舒緩（葉家興等，2013，頁 311）。他更進一步指出：

⁴ 〈陸生三法修正草案三讀通過〉（行政院，2010）。「陸生三法」指的是為了開放陸生來台求學而必須修改的三種相關法令，包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以及《專科學校法》。這些法令規範從制度層面對陸生在台上的國族經驗造成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詳見下文分析討論。

接觸與相處是降低敵意的最好方法。海基會曾委託政大社會系進行一項「台灣形象的建構」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赴台後對台灣社會文化的意象變好。其中又以陸生比例最高，凸顯長期融入台灣社會，確實提高對台灣價值的認同感。即將出版的《陸生元年》訪問了近百位陸生，也印證文化教育除了觀光旅遊以外，建立「台灣品牌」的極佳途徑。（葉家興，2013）

然而，接觸與相處果真是降低敵意的最好方法嗎？陸生來台之後的確如官方所預期，增進彼此理解、為兩岸和平奠定了基礎嗎？「陸生元年」迄今，七個年頭已經過去。第一屆來台的陸生學位生，不少已經畢業返鄉，或是離台開啟新的旅程。從報章媒體與網路輿論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陸生對台的負面評論與報導，諸如：〈請不要炫耀你對大陸的無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只是過客〉、〈台灣，你何時睜眼看看世界？〉、〈要當兩岸交流的橋樑，就要做好被踩在腳下的準備〉、〈台灣請用民主說服我〉等，不勝枚舉。⁵ 其中較具有話題性且廣為人知的，是一位就讀臺大政研所的陸生張逸帆所寫的「你們的健保很好，但我從未向你們乞討」。這篇原本發在個人臉書的文章，先是以嗆辣的口吻逐一反駁了台灣社會常見反對陸生納入健保的理由，最後則是以斬釘截鐵的語氣撂了一句話：「我會很真誠地告訴想來台灣求學的學弟妹兩個字：別來！」（張逸帆，2015）這則臉書貼文不但在網路上引發論戰，也吸引了不少媒體的目光。陸生之中甚至流傳一種說法，說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他們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自己身上的「愛國主義基因」，變得更加愛國。如

⁵ 參見章廉（2013）、馬軍（2012）、丁一（2015）、Vanessa（2015）、胡俊鋒（2014）、楊森（2015）等。

果開放陸生來台求取學位，所換得的是陸生對台灣社會的反感與敵意，甚至來過的人告訴未來的學弟妹「別來」，那麼顯然這樣的陸生政策，如果說不上是失敗，至少與事前的樂觀預期存在著巨大落差。結合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RIP, 426」貼圖一起思考，我們不禁想問：究竟這些陸生來到台灣之後，遭遇了什麼樣的經驗，使得他們心目中的台灣，逐漸從「自由民主的復興基地」，轉變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為了理解上述問題，本文將從現象學的社會學取徑，深入探討陸生的「國族經驗」。本文所稱的「國族經驗」，指的是陸生來台之後所經歷與「國族問題」(national question, 包括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相關的經驗。我們想要探究的問題是：如何理解／解釋陸生的「國族經驗」？如何評估這些經驗可能帶來的效應或影響？在什麼意義下，台灣成為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樣的情形是如何造成的，又是否有可能避免？

二、相關文獻回顧與本研究的定位

關於在台陸生的國族經驗，目前已經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並不多見，而且多屬於初探性質。既有文獻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把陸生來台就學的現象，當成是兩個不同社會文化或群體之間的交流接觸，藉由一般性的認同或敘事理論來加以理解。例如李佩雯（2014）以質化研究的方式，從「跨群體溝通」的社會認同理論探討了兩岸學生的差異，指出既有關於旅台陸生認同的研究主要皆圍繞其政治與國族認同，忽略了其他認同的面向；這個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對來台陸

生衝擊較大的社會認同差異為「族群認同」與「國族與政治認同」，而本地學生感受較強的差異則在於「學生認同」與「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而這些差異，也會進一步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胡紹嘉（2012）則是以一位交換生的單一個案為例，從「跨文化接觸」的理論觀點來分析其敘事轉折與重構的過程，發現該交換生受到台灣社會與政治認同所造成的衝擊與失諧，一方面導致其對母國的民族認同感上升，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採用同理和換位的方式思考。第二類，則是偏重政策實務導向，以問卷調查與量化方法，試圖理解大陸學生來台之後對政治議題的看法及其轉變。例如王嘉州（2011）探討了來台研修的大陸交換學生的政治態度，發現交換生對台灣的主權接受程度偏低，而提升其接收程度的方法，則可透過「提升對台灣政府的喜好程度」、「降低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信任感」等管道。在稍後的一篇論文中，王嘉州（2012）則透過定群追蹤的問卷調查，發現經過四個月的來台生活與學習，陸生對統一的態度總變動率為42.06%，其中9.35%往「儘快統一」變遷，32.71%往「維持現狀」變遷，而造成改變的因素則包括互助頻率、觀選經驗、「離中愛台」變遷程度、作客經驗、閱讀網路新聞頻率等。除此之外，陳志柔透過對兩岸學術交流專業人士的調查研究發現，短期交流改變了他們過去對於台灣的刻板印象，正面態度均好於預期；對於交換生而言，調查顯示他們均被台灣社會的熱情及傳統文化所打動，有的交換生甚至表示台灣是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地方（Chen, 2017）。

上述文獻雖然幫助我們勾勒出陸生國族經驗的大致樣貌，但仍有若干限制與不足之處尚待填補。第一，這些文獻所研究的對象絕大部分為交換生，僅有李佩雯（2014）所訪談的23位陸生中包含8位學位生，陸生胡俊鋒完成於2013年的碩士論文及其改寫而成的專

書有針對個別學位生的訪談（胡俊鋒，2013；2014）。時至今日，陸生學位生來台已逾六年，有關陸生的研究卻仍以交換生為主（Wang and Lan, 2016; Wang, 2016），學位生的經驗仍有待進一步考察。正如本研究將會指出的，交換生無論在身分、心態、生活經驗、人際互動乃至於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制度連帶，皆與學位生有著顯著的不同，造成雙方本質性的差異。學位生與交換生在台灣的生活圈子迥然有別，彼此之間的交集互動不多。事實上，有些學位生對交換生抱持輕蔑不屑的態度，而有些曾經有交換生經驗的學位生則坦言，成為正式學位生後，過去交換生時期對台灣的美好印象都一一消失（詳見下文分析）。本文主張，未來在探討陸生來台經驗時，應把「交換生」與「學位生」分開處理，避免混為一談。換言之，交換生的經驗無法推導到學位生身上，反之亦然。過去的研究多半以交換生為主，對於學位生，還有一大塊空白需要填補。

本文主張，陸生在台的國族經驗，應該理解為兩種相互衝突的民族主義的對撞過程。汪宏倫（2012）曾引用韋伯著名的「轉轍器」比喻，指出兩岸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已經形成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使得兩岸的民族主義如兩列相互朝著對方直奔而去的火車，勢必產生對撞。而事實上，從微觀層面來看，兩岸的民族主義已經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中對撞了。這是因為民族主義並不僅止於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主張，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實作中，成為一種無所不在卻又平常無奇的「凡常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見 Billig, 1995；汪宏倫，2001）。正如 Bonikowski（2016）在最近一篇民族主義文獻回顧中指出，過去的民族主義研究過分傾向於把民族主義當成導致大型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卻忽略了民族主義在承平穩定時期（settled times）的作用。我們不應把焦點局限在政治行動或主張，

而必須把民族主義當成一種日常實作，探討其認知、情感與論述範疇（cognitive, affective, and discursive category）如何影響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們間的微觀互動（microinteraction）。陸生的國族經驗，正是幫助我們理解此一互動過程的重要窗口。

此外，學界近年提出「中國因素」或「中國效應」的說法（吳介民，2009；Schubert ed., 2016）。在某個意義下，這些來到台灣的陸生可說為是中國因素的載體。接受了國家義務教育——尤其是 1990 年代以後不斷增強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陸生，遇到同齡且歷經本土化洗禮，受到台灣民族主義影響（被稱為「天然獨」）的台灣年輕世代時，在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碰撞？同樣地，這些陸生作為行動主體，他們身上所附著的中國因素給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而這些效應又如何形塑了他們的經驗與感受？反過來說，相對於「中國因素」與「中國效應」，中國民族主義也存在著「台灣因素」（汪宏倫，2012；2016）；那麼，是否也存在著一種「台灣效應」，可以在這群旅台陸生的身上發現？這些都是本文將深入探究的問題。

三、理論立場與分析取徑：制度、認識框架與情感結構

為了深入解析陸生在台灣所經歷的國族經驗，本研究採取現象學的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的理論立場與分析取徑。⁶

⁶ 此處註明「現象學的社會學」是為了避免誤解，因為本文的主要定位與對話對象，是社會學領域中由謝勒（Max Scheler）、舒茲（Alfred Schutz）等人所開啟的現象學傳統，而不是哲學領域中的（尤其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儘

根據這個理論觀點，社會現實的客觀實存乃是透過人們的主觀意識建構而成，常民以「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 面對日常生活，對事物不加反省地接受。社會學家在探討常民的生活世界時，必須採取一種「現象學的態度」，將這些自然態度「放入括弧」，不做先入為主的判斷，進而透過還原的方法來揭露客觀現實的主觀建構過程 (Schutz, 1962; Berger and Luckmann, 1967)。⁷

現象學的還原有不同的層次，每一次的還原有如剝洋蔥一般，一層一層地逼近現象的本質核心。本文的第一作者根據謝勒與舒茲所提示的方法，解析出民族主義現象背後的三個層次：制度、認識框架與情感結構。這三者如同心圓一般，構成了現象學分析的三個層次，分別探討民族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倫理學 (如圖 2)。為求行文流暢、讓讀者更容易理解，我們將現象學的社會學的方法論說明、以及其對國族主義研究的理論貢獻，集中在附錄中加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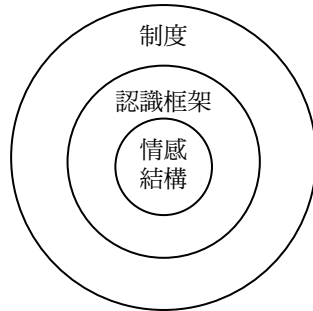


圖 2 國族經驗的三個現象學分析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管如此，本文所採用的分析取徑與概念，基本上仍可說是「現象學的」。有關現象學的界定、以及其與「現象學的社會學」之間的關係，有一些常見的誤解需要釐清，請參見本文附錄。

⁷ 本文的一位審查人認為，現象學的社會學只需分析或描述研究對象的自然態度，不需採用「現象學的擱置 (即『放入括弧』)」，並認為「現象學的社會學」所談的擱置與「現象學的擱置」有所不同，這顯然是對現象學的社會學有所誤解。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見附錄。

下，我們直接就這三個層次的具體內容，分別簡要闡述。

（一）制度

民族主義研究最常見的問題，是術語的混亂與指涉不清。例如，英語的「nation」一詞指的是「民族」還是「國家」，經常要看脈絡才能決定（如 United Nations 是「聯合國」，不是「聯合民族」），而究竟 nation 要如何界定、怎樣才算得上是個 nation，也是眾說紛紜。為了避免「民族」指涉不清、以及將民族「實體化」的問題，社會學者 Rogers Brubaker（1996）主張以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取徑來研究民族主義問題。他在研究東歐轉型與蘇聯解體時，發現制度的設計運作，對於民族的界定、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後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制度論主張國族（nation）應當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形式（institutionalized form）、實踐的範疇（practical category），以及偶發事件（contingent event）來加以分析。制度論不預設「民族」的實體存在，也不預設本質論式的「民族性格」或「民族文化」。「民族／國族」、「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等，都不是與生俱來或天生給定，而是靠著許多交織牽連的制度打造出來的。汪宏倫將 Brubaker 的主張向前推進一步，以社會學的「新制度論」作為理論依據，區分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的分析脈絡，並根據民族國家的兩種理念型（「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發展出一套「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分析架構（參見表 1），藉以分析東亞（包含台灣、日本與中國）近年來的國族問題（汪宏倫，2001；2010；2014）。

表 1 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國族政治中的場域類型與層次

	政治場域	文化場域
國際／全球脈絡層次	國家間體系 國際組織 國際法 跨國仲裁體系	國際間有關「民族文化」的習見 國際知識社群
國家／國內脈絡層次	國防／軍隊 政治體制 戶籍制度與族群分類 少數民族政策 公民身分與公民權利	民族文化 語言與文字 「國家觀」(nation view) 與 世界觀 (world view) (知識體系、意識型態等)

資料來源：汪宏倫（2001，頁 220）。有關本分析架構的進一步闡釋與說明，參見汪宏倫（2001）。

放到兩岸的脈絡中來看，1949 年兩岸分治之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套不同的政治體制，形塑出兩種不同的國族。在公民一領土制度方面，兩岸無論是在集體表徵（國號、國旗、國歌）與政治體制上，均有明顯不同，而在族群—文化制度方面，兩岸所形成的世界觀與國族觀也截然不同。⁸ 我們將與本研究相關的主要制度差異，簡要整理於表 2 中。

從表 2 可以看出，為何制度對於理解陸生的國族經驗具有關鍵的地位。由於兩岸的關係特殊，陸生在台灣既不是「本國人」，也不是「外國人」，因此他們無法享有本地生的待遇，而外籍生的規定也無法適用在他們身上，而必須適用特別的規定（如「三限六不」與排除

⁸ 台灣內部雖然存在國族認同的分歧與統獨立場的差異，但除了極少數急統的人主張放棄中華民國體制、直接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之下的人們之外，台灣的國族想像，基本上仍舊是環繞著中華民國的體制而展開，而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基本上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對立的他者。

健保)。⁹ 這些制度上的限制，深刻地影響著陸生在台的國族經驗與對台灣社會的感受。

(二) 認識框架：從「戰爭之框」到「國族之框」

現象學分析的第二個層次，是認識框架 (cognitive frames)，包含了 Erving Goffman (1974) 的所稱社會生活的基本框架 (primary framework)，以及 Charles Taylor (1989) 所稱的道德生活的基礎框架 (foundational frameworks)。簡單地說，每一個人生活在世上，面對紛然雜陳的各種現象，必須依靠一套基本原則來選取與組織個人經驗，並形成道德判斷，這套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可稱為框架。

國族主義的世界觀，其基本框架可說是「國族之框」，而這種國族之框，又可還原到 Judith Butler 所稱的「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簡言之，戰爭之框是一種「選擇性地刻畫作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的方式，構成了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這個框架區分了「可悼的」(grievable) 與「不可悼的」(non-grievable) 生命，區分哪些生命是被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生命是被刻意忽略、甚至不被認為有資格形成主體的 (Butler, 2009)。¹⁰

「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緊密相關，原因在於近代民族國

⁹ 為了讓陸生來台求取學位，立法院在 2010 年修訂了陸生三法 (參見註腳 4) 中的相關規定，並在此過程中提出了「三限六不」。「三限」指的是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六不」則是指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等。至於健保，因為涉及「誰有資格納保」，因此也牽涉到敏感的國族定位問題，引發許多爭議。

¹⁰ 關於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之間的理論關聯，進一步的闡述參見汪宏倫 (2014)。

家的形成，與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Hall and Malešević, 2013; Wimmer, 2013）。用知名歷史社會學者 Charles Tilly（1992）的話來說，國家製造戰爭，戰爭鍛造國家，兩者可說是一體之兩面。在兩岸的脈絡中，「戰爭之框」之所以重要且有意義，體現在兩方面：第一，中國的民族主義強烈受到「百年國恥」的戰敗屈辱與「戰爭共產主義」的影響，「戰爭／鬥爭之框」深刻形塑著人們的世界觀（汪宏倫，2016）。相對地，台灣的國族問題與東亞近現代以來的一連串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戰爭之框，相互轉化，形塑著人們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汪宏倫，2014）。其次，兩岸關係至今仍被不少人（尤其大陸一方）理解為國共內戰的延續，中共官方更從未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在台灣，雖然「動員戡亂時期」早已結束，但隨著民主鞏固與政體轉型，中共虎視眈眈威脅著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生存，使得許多人將中國大陸視為具有「侵略」或「併吞」意圖的「敵國」。換言之，儘管兩岸關係表面上看來貌似平和，不再衝突對抗，但雙方均存在著互相把對方視為潛在敵人的「戰爭之框」，框構著對彼此的看法。

（三）情感結構：「愛的秩序」、「心的邏輯」與「怨恨心態」

現象學分析的最核心，是一種「心的邏輯」或「愛的秩序」，用學界較為熟知的概念來說，可說是一種「情感結構」。情感結構的概念來自 Raymond Williams，可理解為一種「被感受的思考與被思考的感受」（*thought as felt and feeling as thought*, Williams, 1977: 132）。現象學的理论源頭，則來自謝勒（Max Scheler）根據「情感先天

性」(emotive *a priori*) 所提出的「愛的秩序」(*ordo amoris*) 或「心的邏輯」(*logique du coeur*) (Scheler, 1973)。根據這個理論觀點，情感並非一時的激情，也不是「非理性」而難以駕馭馴服。相反地，情感結構強調情感作用的深刻持久、而非浮淺短暫。透過「愛與恨」的情感，這個紛然雜陳的世界現象有了等差秩序，這樣形成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意義與價值，形塑著人們的世界觀，引導著人們的理性行為。韋伯曾提出知名的「轉軸器」理論，指出推動人類行動的動力是利益，但價值卻如鐵路的轉軸器，決定了行動的方向 (Weber, 1958: 280)。若從現象學的角度進一步分析，深刻影響著人類價值觀形成的，便是情感結構所決定的「愛的秩序」。

在現代社會中，「怨恨心態」(*Ressentiment*) 可說是一種最常見的情感結構，深刻關聯到現代性的形成 (Scheler, 1998)。根據謝勒的分析，怨恨的產生需要兩個社會學條件：一是理論上的平等，二是實際上的不平等。在此情形下，高喊著平等的口號、卻處處展現不平等的現代社會，可說是怨恨的溫床。謝勒進一步指出，怨恨心態可說是因為反復壓抑報復衝動所產生的一種心靈自我毒化，很容易導致價值顛覆的結果。作為一種現代性的產物，國族主義也無法免疫於怨恨心態；在各個不同民族國家的創建歷程中，怨恨都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Greenfeld, 1992)。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中，無論是台灣民族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都訴諸「歷史悲情」與「現實悲情」(參見表 2)，使得怨恨不但未曾在兩岸關係中缺席，而且形成了一種相互衝突、乃至「彼此怨恨」的情感結構 (汪宏倫, 2012)。

上面的分析使我們發現，兩岸無論在國族制度、認知框架乃至情感結構上面，不但互不相容，而且經常處於衝突對立的矛盾中。這些衝突與矛盾，總結於表 2。陸生在台灣所經歷的國族經驗，可說是這

些衝突與矛盾的具體顯現。以下，我們將根據這套分析架構，解析陸生在台的國族經驗。

表 2 兩岸的國族制度、認知框架與情感結構對照表

	台灣／中華民國	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族制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華民國／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種表述：台灣=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台灣尚未（完全）獨立，同志仍需努力） ● 中國是對立的「他者」 ● 自由民主體制 ● 「入台證」 ● 三限六不、健保排除 ● 「天然獨」世代（1990年代之後本土化=去中國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台灣是「自我」的一部分 ●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 共產黨一黨專政 ● 「台胞證」 ● 台灣人的「差序公民身分」 ● 「天然統」世代」（1980後的「愛國主義教育）」
認知框架（戰爭之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東亞戰爭之框」（支那） ● 「抗日戰爭／反攻復國」之框（皇民、漢奸） ● 「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反併吞」之框（流亡政權、中國難民）（參見汪宏倫，201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推倒「三座大山」、洗刷「百年國恥」的「戰爭共產主義」之框（參見汪宏倫，2016）
情感結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歷史悲情：台灣命運受人擺佈，無法當家做主 ● 現實悲情：國際上受到中國排擠打壓，無法使用國旗國歌國號，也無法自稱台灣（cf. Chinese Taipei） ● 愛台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歷史悲情：「百年國恥」的國族敘事 ● 現實悲情：西方強權阻撓中國崛起，台灣的戰略地位與國族象徵意涵 ● 愛祖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陸生的國族經驗：對撞的國族主義之日常生活微觀分析

本研究自 2014 年 3 月起，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對 25 位陸生學生進行訪談，其基本背景資料如表 3 所示：¹¹

表 3 陸生受訪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6	64.00%
	女性	9	36.00%
總計		25	100.00%
專業科系	文科	18	72.00%
	理科	7	28.00%
總計		25	100.00%
教育程度	本科生	3	12.00%
	研究生	16	64.00%
	博士生	6	24.00%
總計		25	100.00%
旅台時間	1-2 年	1	4.00%
	2-3 年	9	36.00%
	3 年以上	15	60.00%
總計		25	100.00%
共產黨員身分	黨員	11	44.00%
	非黨員	11	44.00%
	身分不明	3	12.00%
總計		25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¹¹ 本研究不採取隨機抽樣，原因在於我們的目的不在對母體做統計推論；而不採取一般常見的滾雪球抽樣，則是為了盡可能探討陸生國族經驗的多樣性並加以類型化，避免在同質或類似群體（一般俗稱的「同溫層」）裡面重複相同的類型。

大部分的受訪者處於碩士班階段，旅台時間大體上在 2 至 3 年左右，主要就讀於北部地區公私立院校。訪談採取的是半結構式的開放問卷訪談，除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外，我們主要請受訪者按照時序陳述他／她來到台灣的經歷，特別著眼於日常生活互動中，與國族問題相關的經驗。訪談的最後，我們也會請受訪者闡述自己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並比較來台前後的差異。訪談一般持續 1 至 2 小時，有時則更長。除了深度訪談之外，我們也採取了日常生活的參與觀察法。本研究由兩位作者協力完成，第一作者為台灣籍的學術工作者，同時也在大學授課，第二位作者本身即為陸生。兩位作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大量的機會與陸生互動接觸，因此本研究的取材來源，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互動、以及社群媒體（如臉書、微信等）中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

在研究範圍與代表性的問題上，首先，我們並不宣稱這個研究足以代表所有的陸生，我們的主要關切也不在於呈現陸生的全體樣貌。我們希望針對陸生的國族經驗進行現象學式的分析，因此質化訪談與日常生活的參與觀察是適切的方式，而我們關切的重點是：如何從現象學的分析來深入理解陸生的國族經驗，並加以「類型化」？限於時間與能力，我們僅能在北部地區的學校做訪談及參與觀察，但根據這些有限資料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是有效的，畢竟這些經驗都真實存在。將來如果我們或其他研究者針對北部地區以外的陸生，根據同樣的理論架構與方法，得到不同的結果，那只會增進我們對陸生的理解、讓議題或類型更加豐富（例如，陸生的國族經驗可能存在地域差異，或是存在我們未曾發現的類型），但並不會推翻我們的分析與發現。¹²

¹² 事實上，一個合理的推斷是，由於中南部被普遍認為是本土意識更強的

我們根據上述方法所蒐集到的資料，從以下三部分來解析陸生的國族經驗：（一）初來乍到的新鮮感與文化震撼，（二）制度差異與排除、相互傷害的情感、彼此衝突的認知框架，（三）應對策略：國族經驗的效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歸納出「台灣效應」及其所產生的三種不同類型的反應。因此，這樣的鋪排與組織方式，某種程度反映出時間順序與邏輯因果上的關係。

（一）初來乍到的文化震撼：「原來我們不同國！」

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到台灣來讀書的陸生，多是第一次來到台灣，有些甚至過去從來沒有出國的經驗。對他們來說，這是人生中相當新鮮的體驗，許多陸生也不諱言自己相當興奮。來到台灣除了是第一次的「出國／出境」¹³外，同時也親身驗證了台灣／中華民國在陸生心目中的印象及其象徵意涵。這些印象與象徵意涵，大概包含三個不同但不互斥的元素：中華文化、民主自由、以及民國遺緒。有不少受訪者提到，「聽說台灣是中華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所以過來看一看」（C0708）。而民主自由，則是吸引陸生來台的另一個重要理由。許多陸生在回憶當初為何來台求學時，都提到這個因素：

地區，因此陸生在這些地區的國族經驗，比起本文所分析的北部地區，有可能更為極端，也因此不致於推翻本文的論證與發現，而且可能更為增強。不過，這僅僅是推論，實際情況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¹³ 許多陸生堅持認為來台不是「出國」，至多只是算「出境」，因為在他們的認知中，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不存在「出國」的問題。同樣地，不少陸生認為來台讀書不算「留學」，因為所謂「留學」指的是到外國去求學，而台灣不算是「外國」。一位陸生提到，他在大學畢業時填寫「畢業生去向表」時，找不到可以勾選的欄位，因為他不能勾選「出國留學」，否則就是「搞台獨」（K0528）。

主要還是對台灣比較好奇吧，華人民主社會嘛，這個名字很好聽，很多人抱著憧憬，不只我一個。(H0707)

可能是對自由民主的一些想像，最直接的講法就是我還蠻反共的，討厭那個政治體制，但是討厭是一個負面的情感，對於應該怎樣我不知道，一個好的民主政治或者一個好的民主體制是什麼樣，對於那個時候的我來說，台灣可能是一個我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W0522)

對民主自由的嚮往，隱含著對大陸現行政治體制的不滿，而這也是台灣吸引陸生的另一個理由，即對「中華民國」的憧憬與想像。¹⁴大陸一度流行「民國範兒」，¹⁵至今網路上仍有不少民國粉絲，通稱「國粉」。不少陸生自承來台曾是國粉，對共產黨統治下的當代中國，多少抱持批判的態度，覺得「今不如昔」，因此對於在當前中共體制下遭到貶抑否定的中華民國及其象徵符號，反而抱持肯定的態度，甚至覺得「很酷」：¹⁶

我剛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手續跑完拿到入台證，中華民國入

¹⁴ 在我們的訪談中，發現有不少案例來台讀書的契機，是因為抗拒大陸的研究所考試中必考的政治科目。有的陸生表示，不想在國內「考研」（報考研究所）是因為不想準備政治這個科目，另外還有一位陸生在考研時，拒絕回答其中一道明顯扭曲價值的題目，認為回答這樣的題目簡直是「侮辱自己的人格」，最後卻因此以一分飲恨，研究所落榜，間接促成其來台讀書。

¹⁵ 「範兒」今天多在中國北方地區使用，經常用於稱讚人的外貌和內在特徵有氣派，氣質不凡，含有審美品味的意涵。

¹⁶ 這種心理和不少台灣人覺得日本殖民時期比起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來得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因為不滿現狀，而對過去政權抱著美化的想像。

出境許可證，上面印那個青天白日滿地紅，覺得它很 cool，因為在中國的脈絡來講，它是一個反體制的符號，就很開心很興奮啊，拍照打卡上傳〔網路〕……。當然在台灣脈絡來講，它是體制，它是威權的，但是在中國的脈絡來講完全不是，它是具有反叛色彩的東西，我覺得來台灣唸書這件事情本身對我來講也是有這種（反叛）色彩的東西，這件事情讓我感覺到很興奮。而且與此同時能夠讓我感覺到我是與眾不同的，這個感覺對我來講還蠻不錯的。（W0522，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於在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中，中華民國是個已經滅亡的「朝代」，基本上只會出現在歷史課本和影視作品中，因此不少陸生拿到中華民國核發的官方文件時，都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新鮮感與興奮感。而對中華民國的憧憬想像，不僅存在於有反體制傾向的陸生，也存在於較支持體制的共產黨員，就有陸生黨員認為中華民國國旗歌更能代表中國，看見青天白日旗內心會有觸動，甚至自己親手製作兩岸統一之後的「青天白日五星旗」（Z0527）。

自由民主的體制給許多第一次出境的陸生帶來前所未有的「解放感」，因為在台灣可以讀到各種各樣的「禁書」，上網也因不必翻牆而有了新的快感，眼界大開。由於台灣不必翻牆，因此也更容易獲取到西方歐美的資訊，開闊了視野。繼而發現原來外國人想法有時並非同自己一樣（C0527）。

不少陸生坦承，他們到台灣之後才開了眼界，許多過去在大陸被視為禁忌的相關議題（如台獨、藏獨等），都是到了台灣才逐漸透過「自修」，慢慢補足背景知識，從而調整過去的想法：

原先 Wikipedia 在國內沒有很好用，因為要翻牆，但是在台灣就可以隨使用，然後經常就是看維基百科的詞條，比如西藏獨立運動，然後這個詞條會 link 到一些相關的詞，就是經常翻 wiki，一翻一晚上就過去了，我原先很多歷史知識，在那半年的時間逐漸變過來，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情，不光是獨立運動，或者說台灣獨立運動那個時候有發生什麼，像是西藏獨立運動，還有早期中共的黨史的部分，……就是原先很模糊，或者說原先理解不太妥當的一些知識，在那一段時間逐漸扭轉，……讓我開始能夠逐漸理解到，談台灣這個社會，之所以是現在這樣，它有一個歷史的社會脈絡在。(W0522)

然而，也正是在開放自由的社會中，陸生開始發現自己過去對台灣的認知，和現實當中存在著巨大落差。最顯著的落差之一，就是「支持統一的人怎麼這麼少？」：

我們小時候被灌輸，台獨是小部分，是極小部分，來之前覺得像李登輝、陳水扁這樣的人應該已經臭了。……我來了之後最大的失望是，支持統一的人怎麼這麼少呢？(B0512)

我開始不知道，那些統派會被打壓的那麼慘（笑），就是我後來發現獨派是占大多數的。(K1127)

除了統獨勢力與他們原先預想的不同外，更令他們感到震撼的是，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裡面，台灣與大陸是不同的「國家」，讓他們赫然發現「原來我們不同國」！有些陸生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形

下，讓自己處在難堪的情境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

我是所上第一屆的陸生嘛，所以他們對我也很好奇，我來的第一個星期，第一次小組討論的時候，他們問我怎麼看台灣，我當時就脫口而出：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後他們轟的一下都笑了。我的第一理解意識就是那樣的，因為從小看地圖就那一塊，然後從小接受的教育就那樣子的。當他們問我的時候，我思考都沒思考，脫口而出。(S1116)

陸生在言談之間不經意流露出「兩岸一家親」、「我們都是一家人」等「不假思索」的「自然態度」，卻也經常招致周遭本地人的反彈 (T0620)，這些認知的差距肇因於國族制度塑造出的認識框架的衝突，具體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用語中（例如「中國、大陸、內地」等），經常讓他們猝不及防、難以招架。有些初到台灣的陸生立即在課堂與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反映在語言中的認識衝突 (G0528)。一位來自內蒙的陸生，在課堂的第一次發言便被授課老師直率指正道：「中國就是中國，內地就是內地，我們的內地在南投。」(R0519) 有些本地生則會故意在陸生面前使用「中國」而不用「大陸」(T0519)。

發現到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導致了一種（對陸生來說難以適應的）新的人群分類方式。這種新的分類方式，很多時候並非出現在與政治相關的對話討論中，而是毫無預警地出現在「非政治」的日常生活與課堂裡。一位受訪者表示，在一次日文課上，大家在學習表達我是哪裡人的時候，「所有的同學都說『我是台灣人』」：

我在那邊就卡住，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表達中國大陸這個概念，

就是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這件事情 OK 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要怎麼表達。當時的老師就這樣跟我講：你就說「我是中國人」，這樣就可以了，然後我就卡住，然後就是呃，好吧，呃，好。然後這個感覺讓我覺得很詭異，因為我開始理解到，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面，中國的邊界是不包括台灣的。然後台灣跟中國就是一邊一國。就是這個概念會出來，然後大家也覺得是這樣。所以那個時候我開始認知到這個事情，不過其實也覺得有一種詭異，或者說有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但是這種感覺我也不知道有持續多久，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就接受現實了。(W0522，黑體為筆者所加)

如前所述，很多陸生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赫然意識到自己對台灣的國族地位認知，與本地生／本地人存在著巨大落差，也因此發現自己經常突如其來地處於一種尷尬的情境中。這可說是大部分陸生剛到台灣時都會經歷過的「文化震撼」。對於這種「詭異」又「不太舒服」的感覺，有些陸生能夠逐漸習慣且「接受現實」，但許多陸生則非如此。這更加劇了日常生活中的國族主義對撞，下一節將進一步討論。

另一方面，一部分陸生在來台求學之前，曾經以交換生的身分來過台灣。和第一次來到台灣的陸生相比，這些陸生對台灣雖然較不陌生，也沒有初來乍到的文化震撼，但他們很快發現，對台灣的印象迅速改觀，和當初以交換生身分來台所留下的美好記憶形成巨大反差：

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普遍交換生對台灣的印象都不錯，也有不好的，但是很多都很好，可是一變成學位生，以前交換很美好的

airiti

印象全部打破（笑）。（H0707，黑體為筆者所加）

在我們訪談的陸生中，凡是過去曾有交換生經驗的，幾乎毫無例外地表達了類似的感受。這背後大致有幾個因素。首先，在客觀條件上，學位生與交換生處於十分不同的制度情境。交換生不必像學位生一樣，必須繳交本地生兩倍的學費才能入學，而台灣教育體制對學位生的排除（三限六不、無法享有健保等），交換生也感受不到。然而，一旦交換生成了學位生，上述的種種不公與限制都加在他們身上，相對剝奪感的心情油然而生。再者，交換生在台時間相對短暫，修課時數較少，因此與本地生接觸的機會、時間與頻率也少了許多，也可能更容易避免了彼此衝突與摩擦的產生。

最後，則是主觀的心態不同。不少學位生承認，當初以交換生身分來台時，只想把握時機遊山玩水、好好探索台灣每個角落，對於學習課業反而不是那麼在意。即使在課堂上或生活上與本地生產生摩擦或衝突，也因為自己只是個短暫的過客而不在意。但一旦成為學位生之後，對課業、生活與人際關係，都更加嚴肅地看待，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因為這些（本地人）將會是我這輩子很重要的朋友」（D0623）。但也正是因為如此，當學位生發現本地人的民族主義帶給他們不快的刺激時，感受也更加深刻強烈。

正是在這些主客觀因素的相互刺激之下，陸生與本地社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逐一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來。

(二) 制度差異與排除、彼此衝突的認知框架、相互傷害的情感

如前所述，台灣與大陸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國族制度、情感結構與認知框架上面。不同的國族制度，一方面造成雙方的差異，一方面也造成區隔排除的效果。陸生由於與本地生的身分不同，制度上遭受許多排擠限制（三限六不、無法納入健保等）。

另一方面，本地人由於長期遭受中國打壓，累積了許多的「報復衝動」。這些報復衝動無處宣洩，除了很容易導致怨恨心態外，也極力在其他事情上面尋求心理補償（Scheler, 1998）。有意無意地展現自己「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便是其中之一。這種優越感，在不同的民族主義中都經常可以觀察得到（Greenfeld, 1992）。此外，台灣數十年來的反共教育，把中國形容成是一個政治上極權專制、經濟上落後貧窮、文化上禮崩樂壞的地方。這些制度遺緒結合上前述心理補償的機制，更讓許多人無法適當認識當代中國，甚至衍生出莫名的優越感。這些優越感經常體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繁簡字體的差異，二是台灣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就有台生認為陸生不識繁體字，無法同古文交流（T0519），并時刻流露出高人一等的感覺，使得陸生覺得非常反感（R0519）。而一些台灣人因為自由民主所產生的制度優越感，甚至藉此質疑陸生在旅台期間參與校園自治的正當性（例如選舉學生會長），更是讓陸生覺得如同膚色遭受質疑的歧視（G0528）。

陸生把這種差別待遇比擬為「種族歧視」，因為他們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出生決定論」：只不過因為自己生在一個非民主體制的國家，就注定要受到排擠歧視。一位陸生如此描述其遭到歧視的經驗：

下課的時候大家就是 group 討論，我就準備發言說：那我來講一下我的觀點，有台生就說：哎呦，你們非民主國家的人沒辦法理解這個問題的啦！然後我就覺得：天啊！這個書還能唸下去嘛？……我當時整個人都崩潰了，我就把書包收一收就走了。三天沒有去上課。……反正那年那個時間段（按：指 318 學運期間）接連的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就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跟之前那種誤解是不一樣的，這是一種攻擊**。我來自非民主國家就沒有資格唸社會學嗎？……我是抱有一定的社會學的理想跟想像才來的，他這種做法，第一就打破了我對於一個社會學學生的想像，就是一個好的、受過訓練的、表現良好的一個社會學學生的做法。然後第二就覺得，我要怎麼樣跟這個人做朋友？第三，我的社會學在台灣要怎麼進行下去？我的學習要怎麼進行下去？**就覺得是一種……就是世界觀的摧毀**。（D0623，黑體為筆者所加）

「世界觀的摧毀」，意味著原本抱持的「自然態度」已經無法在台灣繼續生活下去，必須有所調整，否則連學習課業都有困難。這種對自然態度的衝擊所造成的效應，將在下一小節深入探討。

另外還有一種優越感，純粹是建立在對中國大陸現狀的無知之上，也就是把中國大陸視為一個經濟發展比不上台灣的落後地區。許多來台的陸生，都曾經歷過本地人讓他們啼笑皆非的提問，例如：「你們的廁所有門嗎？」「街上是不是還有馬車？」「你們那裡有高樓嗎？」「你們那裡有人情味嗎？」等等，不一而足。雖然有些提問並無根據，但能夠來台讀書的陸生，基本上都來自相對富裕發達的城市地區，因此這些看似「無厘頭」的提問，除了讓他們感到無奈

外，也加深了他們與本地人溝通的挫折感。

我們有個同學，他們系也有個人經常跟她說，××你看你這麼好，以後就不要回中國去受苦了吧，我給你在台灣介紹一個好人家。……有些人真的就以為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T0519)

有的陸生直陳，台灣某些地方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令人震驚地匱乏」，對中國充滿了偏見：

大學的時候……修了一堂課，然後跟著一起去花東有一個原住民區，……有一個原住民的阿姨，大概五六十歲，然後她就吃飯的時候給我夾雞肉說：小姑娘多吃一點，中國有沒有雞肉啊？我當時整個人都（呆了）……我想說，天啊，這個村上的人，中國女生、中國新娘是怎麼活下來的？那次經驗就是讓我後來對於進入台灣非常 local 的，就是覺得他們對於中國的認知令人震驚地匱乏。我碩一的時候，有一次去麥寮做田野。也是發生很類似的事情。那邊很多……農夫他們會把一些東西賣到中國。然後他們就會講，中國人很壞，中國人都……，我在底下我就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然後我就說，嘿啊（筆者按：台語的「是啊」，此處意味著受訪者以台語接腔，喬裝自己是本地人）。他說中國人都很壞，我們的生意都被他們搶了。嘿啊。這樣。我想說，我不要做台灣研究了。(D0623)

這些偏見，說到底，其實和台灣人對中國的報復衝動有關。上述例子中的農民，因為不知道眼前的陸生來自對岸，所以肆無忌憚地說

中國的壞話，但有的時候，陸生一旦曝露自己的身分，可能招來更多直接的攻擊。對許多台灣人來說，中國長年在各種場合打壓台灣，積鬱已久，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逮到活跳跳的『野生 426』」，難免見獵心喜，想辦法藉機報復。許多陸生遮掩不了的口音，很容易曝露身分，讓自己成為攻擊的箭靶（B0317）。

日常生活免不了要與人交談互動，但只要一開口就會不小心曝露身分，因此遮掩不住的口音常給陸生帶來不小的壓力與困擾，甚至有陸生表示不敢去菜市場買肉，受不了與人交流時遭到另眼看待的目光（S1116）。不見得每一位陸生都很在意自己的口音，但這的確是日常生活中標誌著「我是外人」的一個重要印記。儘管說著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國語／普通話」，但陸生只要一開口，基本上仍可以讓本地人立刻區辨出「我群」與「他群」。相形之下，來自南方（尤其閩南地區）的陸生，口音與本地人相近，有些甚至可以操持「台語」（閩南語），蒙混成本地人。一位來自閩南的陸生就曾在微信群組中，諧謔地展現了他喬裝成本地人欺負大陸人的過程（參見圖 3）。

這段充滿諧謔意味的對話，同樣隱含著陸生對本地人的「報復衝動」。它點出了一個事實，即陸生「舌頭攤不平」的口音，在台灣很容易招來歧視，而這位陸生藉由模仿台灣人的口音，好不容易「也品嚐了一回台灣人欺負大陸人的滋味」——雖然很諷刺的是，他所「欺負」的對象是同樣來自對岸的交換生。台灣長期遭受中國打壓，讓許多台灣人忿恨難平，但這些陸生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卻恰恰相反：是台灣人欺負大陸人，而非反之。這形成了一種「相互怨恨」的情感結構，很容易造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



圖3 品嚐一回台灣人欺負大陸人的感覺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資料。

陸生在日常生活所面臨的「被歧視」與「被欺負」的經驗，有一部分來自學生生活中最重要的場域——課堂。有些陸生曾面臨來自老師的直接挑釁：

我第一次上課就和老師吵了一架，因為老師一聽我的口音不對，就問你中國來的是不是？當時我愣了一下，然後說我是大陸來的，so？我當時沒有特別的想法，就覺得莫名其妙的，**那時候聽到中國兩個字還是有點刺耳**。然後老師第一個問題就劈過來了：你憑什麼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結果班上全安靜了，當時我們系上有三個陸生，當時老師的問題一說完，有個陸生拎著

包就直接從後門走了。另外一個上完這堂課就把課退掉了。當時我就反問他，憑什麼覺得台灣不是？然後老師就寫黑板，是計劃好的，然後就把想說的話寫下來。然後這一堂課就開始說台灣為什麼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從中國的史料來說，然後老師寫滿了一黑板，跟我們一直講，那個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很震撼，因為以前我都不知道這些。老師甚至問我，你們歷史書怎麼講，然後我就說我們怎麼講。(X0118，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位陸生不僅在第一堂課就遭遇老師的下馬威，到了期末，更面臨了意想不到的難題：

考卷上有一題就是：請從書中找出證據，證明台灣自古以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時看完就覺得這個老師是不是故意的，因為難道我就一定要支持統一或者支持獨立嗎？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支持統一又怎麼了？所以這題我就空著不寫。後來我就想怎麼辦，這門課應該會被當掉了……結果最後成績出來真的是因為那道題目，整個 25 分就沒有了，然後我就只有 50 多分這樣子，老師就在試卷發還回來的上面寫六個字：不會寫？不敢寫？(X0118)

老師出了個難題，學生因為無法（或不想）回答而被當，已經付出代價；但老師刻意在試卷寫下「不會寫？不敢寫？」可說是一種「乘勝追擊」的挑釁，更讓陸生覺得不是滋味。也許從這位老師的觀點來看，台灣長期受中國打壓，累積的悶氣無處宣洩，如今好不容易逮到一個主客易位、權力關係翻轉的機會，羞辱一下中國人也

只是「剛好」而已；但從陸生的角度來看，這無異於把意識形態帶入課堂，是難以接受的行為，反而認為是那些挑釁的老師被洗腦了（X0620）。另一位陸生則說：

有個老師比較激進，上課就直接開地圖炮¹⁷說，我每次去投票的時候都給我大陸朋友掛一個電話，說我去投票了，你們不能投票，你們就是一個非常專制的國家。反正就說的很難聽，那我聽完之後就說，你身為一個老師，這樣說話 OK 嗎？他問：你是中國來的？我說：是啊。總而言之後來就跟老師吵了起來……後來這個老師還在《自由時報》上發文章，記得內容好像是說我在課堂上教育中國學生之類的。然後系主任看到了還把鏈結發給我，問這個是不是你（大笑）。（X0118）

除了老師之外，陸生也經常從同學那裡感受到不友善的態度，乃至刻意的挑釁與歧視：

有一個同學……我覺得他不是針對我，可是他們在某些時刻、那個瞬間他就會直接想攻擊你作為一個……一個東西的活體這樣子（筆者按：也就是另一位受訪陸生所說的「活跳跳的 426」）。有一次，我就在餐廳一個人吃飯，然後那個同學就跟她男朋友還有其他幾個同學一起在吃飯。然後大家一起坐，旁邊一桌坐了幾個交換生，那種口音很明顯。後來那同學就冷不丁來了一句說：幹！這些中國人就像螞蟻一樣爬滿校園！然後我就整個人爆（掉了）。我想說：欸？什麼意思？坐在你對面吃飯的是個螞蟻嗎？

¹⁷ 所謂「開地圖炮」，指的是根據地域來評斷人群、彼此爭辯。

然後我當時飯都吃不下去了，就噁噁嗚嗚的在那邊，我也不知道講了什麼，反正我整個人腦子已經不好了，然後我就很快跑掉了。(D0623)

這位陸生也曾碰過室友在淘寶網上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劣質便宜手套，刻意在其面前嫌棄中國貨不好，有些同學甚至拿著中國出版的翻譯書，當面質疑中國人的英文都很差：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股怒氣，就是需要一個明確的發洩點，然後呢，但是這個明確的發洩點呢，就是台灣學生坐在一起的時候還不足夠發洩，但是當你這個人出現的時候，他就覺得把你想像成那個罵的比較爽。我覺得他應該就是這種心態。(D0623)

由於很容易成為台灣學生發洩怒氣的對象，這位陸生在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生怕無意中招惹了本地生。但無論如何小心，生活中還是經常因為小事而招來辱罵，讓她覺得特別受傷。例如有一次，因為宿舍浴室的門設計不良，她不小心在關門時發出較大聲響，引發隔壁本地女同學的不滿，甚至給男友打電話大聲地說：「我就是討厭中國人！」(D0623)。

陸生在生活中為了小事感到受傷，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也可能在無意間「傷了台灣人民的感情」而不自知：

我有一門課，這個老師非常非常綠，而且他從不去大陸，老師上課什麼的都還好，我們雙方都知道對方，但是大家都很客氣。有一次交報告，因為你需要引用別人的文章，那我就找了一篇台灣

人（在大陸）寫的文章，然後這篇文章就把什麼機構加了一個引號，我也就這樣加了一個引號，寄過去的時候，他就回了一封信，然後寫的還蠻長的，就是說我知道北京政府不承認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可是你這麼做就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感情之類的。（X0620，黑體為筆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陸生在來台之前，甚至來台之後，對於「中國（北京）打壓台灣」這件事情，是缺乏認識的，因此對於本地人對他們的不友善對待，無法理解背後的來龍去脈，只覺得自己很無辜。有些陸生指責台灣人雙重標準，卻無法理解自己在台灣人眼中，其實是整個中國的「共犯結構」之一。一位陸生坦承，在來到台灣之前，幾乎從來不知道北京政府對台灣的打壓，反而認為大陸經濟上的讓利其實對台灣人非常好：

我第一次感受到北京是有多麼的狠，就是他在服貿協定上。他敢對台灣這樣子是因為他已經布了一個非常大的局，就是把你逼到角落……完全沒有退路……就是如果我是台方代表我絕對簽不下去的，……我能理解那種感受，對不對。那一次我真的是徹底的去研究一下整個大陸的經貿政策，我覺得那個就是環太平洋統一策略，他就是組了一架環太平洋自貿戰車，就這麼給你碾過去，你要嘛吃我統一的毒藥吃到死，要嘛就是被我碾過去，特別狠。（Z0527）

面對本地人的各種挑釁與有意無意的歧視，有些陸生也發展出一套「以牙還牙」的策略，進一步造成情感上的相互傷害。當台灣人以

「外國人」稱呼陸生時，有陸生就以「台灣省」回敬，或是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刻意強調自己是“Zhejiangnese”，藉此凸顯“Taiwanese”也不過只是個「省級」稱謂而已（T0519）。

台灣社會長久鬱積對中國大陸的不滿，在2014年的318學運（或稱「太陽花運動」）中全面爆發。對許多當時身在台灣的陸生來說，這幾乎可說是他們在台灣國族經驗當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台灣社會鋪天蓋地的反中、仇中情緒，直接作用在他們的身上，無所遁逃，最直接的結果是造成了旋渦效應，陸生被捲入服貿所引發的國族矛盾（X0118）。

318學運期間，不少老師把課堂拉到立法院外上課，有些陸生便因此被帶到運動現場感受氣氛。另外還有一些陸生是以個人身分來到現場，默默觀察。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陸生在現場所感受到的經驗，讓他們格外難受：

那時候我在現場待了很多天，一瞬間我很想上去搶麥克風，因為我覺得他們說的東西很不對啊，比如說談淘寶、談電子商務，因為有些東西我覺得你做不好被淘汰很正常，大陸的電子商務搶佔台灣的電子商務，你自己審視一下淘寶在服貿來之前它已經進來很久了，另外台灣的網購是很不方便。（X0118）

這種「想上去搶麥克風」的衝動，很多陸生都曾提到，但要不要替自己的祖國辯解，每個人內心都很掙扎：

（318的時候）我自己就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就是當時那種氛圍，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在那邊很尷尬，旁邊一群台

灣人，全部在攻擊中國，那我去辯解呢，還是不辯解呢，很難。
(G0528)

面對龐大的社會壓力與集體獵巫的氛圍，絕大多數親臨現場的陸生選擇沉默以對，敢怒而不敢言：

當時那種社會氛圍已經是沒有辦法很理性的去討論這種東西了，即使你很理性的去討論，很可能別人也認為，啊你是國民黨的黨工，你是中共的走狗，你是中國人，你是 689，你是什麼（另一名受訪陸生同時說：426！），更難聽的話還有嘛，對吧。
(G0528)

儘管表面上選擇噤聲不語，但這些陸生內心充滿了忿恨不平的情緒，有陸生看見台灣人罵「中國狗」、「支那狗」，恨不得上前與之幹架（C0708），卻又怕寡不敵眾，只能在陸生圈內私下發洩：

坦率來說，就服貿這件事來說，就事論事，如果我那個時候在台灣的話，我會參加，也許我會進去。因我是從某種程度上認可，但是因為後續的一系列東西會讓我覺得……就是後續它會用一些國族認同，中國因素來煽動這件事情的時候，那我會覺得你為什麼不能就事論事，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日本，是什麼話呢？
(S1116)

在一片對中國的敵視、醜化的氣氛中，陸生的身分很容易成為集體獵巫風潮下的替罪羔羊，例如網路上有人抗議海基會提出要改善

陸生待遇，而對台灣青年漠不關心，在一些陸生看來都是無妄之災（T0520）。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攻訐、醜化卻無法還口辯駁，陸生的心中也逐漸對台灣社會累積了不少報復衝動，足以形成怨恨心態。在此情形下，一種出於自我防衛的國族主義認同，也油然而生：

其實我個人非常強烈的中國認同是來台灣之後被形塑的，我以前在大陸是一個是一種非常反體制的年輕人，非常覺得老共很討厭啊，怎麼這樣統治人民的，強拆什麼的，怎麼這麼不尊重人民的權利什麼的，……來了之後可能就因為受到台灣這種獨派或者綠營的這種對中國的抹黑，去挑撥這種關係，你會覺得，哎，怎麼是這樣，你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防衛性的民族認同，就是你要來對我有攻擊性，對我有這種污衊，我要防衛我自己，所以我反正把我自己的中國認同給加深了，尤其 318 那個時候。（G0528，黑體為筆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陸生不僅防衛型的自我認同加強，他們對台灣社會的現實感受，也起了變化：

這種情況下，你會產生自衛型的民族主義的認同，尤其某些事件可能會加深（認同），比如說 318。其實我也很理解，你像以前美國那個刺蔣案，黃文雄去刺殺蔣經國，他當時說了一句話麼：“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有時候我在想，我們在台灣講“Let me stand up like a Chinese.” 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蠻有趣的。（G0528）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個說法引喻失義，但如果仔細解讀，可以發現後面反映出的陸生的心理狀態與其對現實的認知。黃文雄當年去暗殺蔣經國是冒著生命危險，當他說出“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一說 like a man）這句話時，是被美國警察制伏在地上，而他之所以選擇走上這條路，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高壓統治，讓他覺得忍無可忍，只好訴諸極端的暴力來表達訴求。當陸生想對台灣人說出“Let me stand up like a Chinese.” 這句話時，似乎也暗示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仇視與敵意，讓身為中國人的他覺得自己彷彿被打趴在地上，已經到了毫無尊嚴、忍無可忍的地步——儘管台灣社會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壓迫者，反而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真正的壓迫來自於中國。

在整個社會瀰漫著仇中、反中氣氛的情形下，原本顯得不那麼受到矚目的制度排除，即「三限六不」與健保問題，也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引發公開爭議。陸生發現自己必須繳交比本地生、甚至其他外籍生更高的學費，但所受的待遇卻是連外籍生都不如。¹⁸ 有些陸生也逐漸發現，原來台灣開放陸生並不是打從心底歡迎陸生，而僅是把陸生當成解決台灣高等教育問題的工具。這種「被剝削感」與「被工具化」的認知，更是加深了陸生的不滿。一位陸生就直陳台灣以市場導向思考陸生政策，把陸生當做解決台灣生源減少，私校瀕臨破產的救命稻草，而非整體上解決台灣當下的高教困境（D0522）。

由於整個大環境對陸生並不友善，陸生之間「抱團取暖」的情形特別明顯，無形中更加深了與本地生之間的隔閡甚至敵意：

¹⁸ 陸生的收費其實是比较照外籍生，但因為外籍生可以申請獎助學金、也可以擔任助理，陸生則被排除在這些機會之外，因此感覺上，陸生覺得自己比外籍生繳了更多學費。

以大環境來講，首先政策不友善，第二個輿論不友善，使得陸生更難以深入了解台灣，我在××（某私校）感受到的很明顯是，第一屆的同學到大二開始，開始形成陸生小圈圈，一直維持到大四，他們百分之八十的生活時間就是跟陸生在一起。然後反正就是抱團的現象非常的嚴重，在國外留學的很多大陸學生也就這樣的狀況嘛，就沒有辦法跟當地的文化融入的，但是台灣更是如此，因為陸生會有自己的facebook 群組啊，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大家就在一起吐槽，就一起罵台灣人，促進團結（笑）。

（D0522）

在歷經許多不愉快的國族經驗後，陸生的積怨逐一爆發，在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張逸帆事件」中，更是表露無遺：

說真的，我來這裡呢，就是唸個書，然後走人；從來沒有想要在這裡留下來，未來也不會有這樣的打算。我很慶幸自己在這裡認識了許多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師，值得交往一生的朋友，但我無法接受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生活下去。他們一邊肆無忌憚地辱罵著你的出身，一邊又以文明與先進自居。龍奶奶說，請用文明說服我；那我現在用這句話還贈當今的台灣，也請你用文明說服我。我會很真誠地告訴想來台灣求學的學弟妹兩個字：別來。（張逸帆，2015）

針對張逸帆的批評，本地生也不甘示弱，投書媒體揭露了陸生在台灣遭受歧視對待的背景脈絡：

我想讓你（陸生）知道，在維護台灣人民醫療權益這部分，有個歷史傷痕，是你們祖國造成的。因為，你們祖國對於台灣「醫療保障權」，曾經有過無情的打壓，狠心的傷害過，這個歷史傷口，我不能不讓你（陸生）知道！……你們祖國當年是怎麼對待台灣的，而台灣當時是多麼希望「能夠融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共同體」，就像你現在的文章寫的，你們對於加入台灣健保問題，是多麼期待「能融入台灣這個生活共同體」一樣。（林弘展，2015，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裡所稱的「歷史傷痕」，指的應該是台灣常年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體系之外，而這個「新仇舊恨」，直到2018年的今天仍持續上演著。¹⁹ 這個脈絡不難釐清，但並非所有的陸生都能感同身受，正如許多本地人對於陸生在台灣所遭遇的種種感受並不了解，也缺乏理解的動機——畢竟對方是「他者」、甚至是「來自敵國之人」。根據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之框」，對於威脅國家主權與主體性的敵人，是不必客氣的，否則可能危及自己的主體存在，生存與尊嚴無法得到保障。

（三）陸生的應對策略與國族經驗所產生的「台灣效應」

上述的國族經驗，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應呢？我們從所蒐集到的訪談資料與田野觀察，歸納出兩種效應與三種類型。兩種效應，指的是

¹⁹ 2009至2016年馬英九主政期間，台灣曾得以觀察員身分與會，但2017年後因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得台灣再度缺席世衛組織年會。

國族經驗所產生的「推力」與「拉力」；三種類型，則是指上述兩種效應所分化出的三種不同類型的陸生。

1. 效應一：推力

由於整體的制度、環境與氛圍對陸生並不友善，因此陸生在台灣所經歷的國族經驗對他們產生一種推力，可說是不難想見的事。有的陸生很清楚地表示，台灣是個不友善、讓人（陸生）找不到歸屬感的地方，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一位曾經留學法國的陸生，比較了「留法」與「留台」經驗的不同，認為在法國反而比在台灣更讓其覺得安心：

我之前對這裡的想像過於美好，來了之後發現說，這裡的人跟你完全不同，你會覺得對他們的那種心理預期是高過他們所反映出來的。比如之前在法國，你知道說你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人，但是有所收穫之後，你覺得噢原來他們比你想像的好，可是在這裡你原本的心態是，語言沒障礙啊，什麼的，可是其實你會覺得這裡的人其實對你並不友好。(X0620)

若是進一步比較，法國也有排外或反移民的風潮，但那是普遍針對外來者；台灣的情形正好相反：台灣社會對外來訪客普遍友善，但對來自某些特定區域的人（例如東南亞移工），卻常有歧視，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也經常另眼看待，甚至加以排斥或報復。

我覺得假如你要長期待在一個地方，你要至少要對一個地方產生一種歸屬感這樣的，可能就會讓你覺得稍微有一種家的感覺，可

能這個地方在硬件方面沒有辦法達到你的預期，但是在軟的一些方面，又讓你感覺他在排斥你，如果對這個地方越來越沒有一種想要依靠，想要融入的感覺，你就想盡快離開啊。(X0620)

這種讓人想「盡快離開」的疏離感，若是結合上政治因素，對比於來到台灣之前的憧憬，反感就更強烈了：

為什麼我們在大陸的時候，對台灣有憧憬？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大陸的時候會受到一些我們只能見到一些這個體制內我們很不滿的事情，我們會把這些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投射於我們了解的，好像知道的一個想像的地方去，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寄託，我個人寄託中華民國的。(R0519)

抱持這種想法的陸生不在少數，然而，來到台灣之後，他們卻逐漸發現「希望有多大，反感就有多大」：

但是來了之後我就對中華民國就是非常非常失望。就覺得說，它這個民主制，我看到的這種把西方民主移植到華人社會之後他這種優點遠遠小於缺點。(Z0527)

當初來台灣的時候，我把這裡當做中華民國的正統來看，它應該作為一個政府來說所擁有的大的眼光和視野，大的格局，這樣的一個想像，然後來了以後發現和原來想的不一樣，它是小國寡民，它看問題是非常狹隘的。(R0519)

陸生眼中的中華民國是「小國寡民」，「非常狹隘」的評語也適用在不同的黨派立場。事實上，最讓一部分陸生感到「崩潰」的，並不是主張台獨的綠營，而是表面上主張統一、事實上卻欲振乏力的藍營，或是所謂「中華民國派」。許多陸生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是「國粉」（因為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的粉絲不是什麼光采的事），但言語之中還是忍不住以調侃的口氣大談自己或他人作為國粉的失落感：

到台灣最大的一個感受是什麼，我覺得當個國粉真不容易，真的。國粉到台灣來他們真的要轉成共粉了。因為我以前不是國粉，但是以前經常調戲國粉。但是到這邊來之後發現……哎呦，國粉真的更難當了，以前還不知道，以為國粉到台灣來還能很有認同感。現在發現，哇操，國粉到台灣來真的要罵爹喊娘了。……國粉唯一的想法就是說，中華民國還在台灣，結果到這邊發現，哎呦中華民國在台灣都是個問題。麻煩大囉。所以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既然這麼不帶勁……就麻煩了。而且，國粉還有個說法，我們國民黨在台灣治理的很好，對吧，這是國粉的一大法寶，說我們這個叫什麼台灣經濟起飛什麼東西，治理非常好，……還挺有道理的。然後結果到了台灣之後發現，哇，國民黨既然也變成這個萬人踩的對象，可免死狐悲了。（C0527）

對藍營是「兔死狐悲」，對綠營則是同仇敵愾，反台獨的立場更加堅定。不少陸生都表示，來台灣之前覺得台獨沒什麼，來了台灣之後反而對台獨產生極大的反感：

(來台前)我曾經戰過很多人，尤其是大陸北方的學生。我說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你們為什麼抱着這種想法？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統一人家？你這樣非常不尊重人家，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對不對，你這是不是壓迫人家嘛？來到台灣之後，我這個想法也徹底轉變了。(Z0527)

其實我來之前就覺得，台灣獨立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在美國的時候，獨立宣言被美國人視為聖經的東西，……我就覺得台灣並不是一定要統一，獨立也可以。但是時間久了以後，你會發現……他們這種心態有問題，時間久了老是這種負面的情緒，然後抱有這種很壓抑的受迫害妄想症，然後經常不理性的行為，然後這種很阿Q的心態，看久了就會覺得這種人怎麼……你就會覺得不入流的感覺。(H0707)

有些陸生表示，自己並非不能接受台獨的理念，而是對台灣社會（或支持獨立者）覺得反感，覺得（某些台獨主義者）心胸狹隘。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情感，則是在台灣求學期間意外地增強了（H0707）。

我覺得我們（陸生）跟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樣的，是挑戰——回應式的，因為我來的時候並沒有帶著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來了之後反而變成這樣，我覺得是被那幫台獨腦殘害的……我覺得我本來並不是一個非常國家主義者的人，是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態度，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中國）變成這樣是因為制度的問題，或者是我把自由民主想的太好了，每個人都能容忍

別人的態度，但是到了這邊，發現在課堂上（有關為大陸辯護）直接被老師打斷，後來也就發現原來只不過是捍衛自己的那個言論自由，並沒有達到伏爾泰所說的（「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那個樣子。（T0924）

這些經驗造成的結果，就是使陸生「往中國民族主義一直靠」，「原來的鴿派也會變成鷹派」，而台灣就成了陸生眼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我其實以前對於中國的這個國家他的那種感覺跟那種想像，我以前並不是特別紅。但是我來到台灣之後，覺得我完全轉成中國……往中國民族主義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Z0527，黑體為筆者所加）

原來對台灣有一些憧憬，有一些想像吧，結果來了（之後），原來鴿派的人反而會變成鷹派，（來到）這邊會有更強烈的反抗。……我講過，來台灣之前，台灣是民主自由復興基地，來台灣之後，台灣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R0519）

台灣人就是……只要你的立場跟他不一樣，他們就說你是共產黨。天哪！想當年我們都是「反共」才會來台灣的好不好？是台灣人自己把我們往共產黨懷抱裡推。（T0623）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背後的「戰爭之框」，在陸生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中，也起了作用。不少陸生認為，兩岸必有一戰：

或者說就是民族的宿命，哈哈……我們對未來的擔心就是，這兩股勢力日後必有一戰……所以說這個有時候我們從長遠來看，我個人判斷是，還是有個不可避免的對抗。(G0528)

即使是較為同情理解台獨的陸生，也抱持著相當悲觀的看法：

我覺得相互的理解或者相互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是有這樣的作用，可是這樣的作用不一定會帶來和解，有可能會帶來戰爭。今年發生那個周子瑜的事件時候，我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就是兩岸問題要想徹底解決就只有打仗。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我們的意識形態差太大了，你去看大陸的那些網民的意見，或者就是我認知的一些同學，他們就是台灣一定要統一啊，我這邊所接觸到的觀點，是大部分我的台灣朋友，都是本土立場，支持台灣獨立，那這樣怎麼重合，沒有辦法就是打仗啊。(D0522)

為什麼非打仗不可？一位陸生的看法，頗能印證前文所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中，「台灣因素」的象徵意涵：

中國人認為，西方對我們的打壓有結束嗎？並沒有。美國或者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總認為日本還在找我們麻煩，釣魚島啊什麼的，所以會認為說台灣獨立可能是美國、日本去攪掇的，就是想繼續來打壓我們，所以當然要反抗，其實他反而會認為他是弱小的，但是跟台灣來比，他其實是強大的，你說他弱小沒道理，但是其實也有點道理，所以他會有心理上我一定要統一，就是說我如果沒有把台灣收回來，中國近代史整一個屈辱沒有結束，我一

定要結束之後國家才能回來常態，才能和平崛起啊。(G0528)

在不少陸生的認知裡，民族國家與戰爭是密不可分的：統一可以靠武力，獨立也必須靠武力：

(如果台灣獨立)我覺得一定會打。我支持。我覺得是根深抵固的，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既然你選了要這種方式，就是台灣要走到那一步的話，它一定要面對可能的威脅，所有的民族獨立絕對是打出來的，你不去犧牲，你天天老想著和平獨立，這個呵呵，很難的。(K0528)

在這種思維邏輯中，「獨立」與「戰爭」是分不開的：想獨立就得付出代價，既要和平又想獨立，簡直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天下沒有這種不勞而獲的事情。共產黨的江山是打出來的，中國的獨立也是打出來的。這種思維背後，基本上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邏輯。有陸生以克里米亞來比擬台灣的處境：

其實就類似克里米亞，俄羅斯一占，國際上不承認也得承認啊。(G0528)

島鏈這種論述，在民間很重要。老百姓想的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什麼好談的。你像特別老一輩的，比如 2016 選舉完了，來來來趕緊打台灣，年紀大的都這種想法，就是現在國民黨在台上不方便，民進黨上來就有理由了，就是根深抵固。(K0528)

若被問到「為什麼非統一不可？」，則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論述，便反映在 80 後與 90 後的歷史認識上：

中國的年輕人 90 後，或者是一部分 80 後他出生以來，我們的國民教育整一個中國的，或者內在的統一的意識對他的影響，是天然的，台灣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國力的確是不斷的變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的經濟使得年輕人自信開始越來越足，當然我認為自信不是一個壞事，但問題就是，你有了自信以後你就會想的理所應當，就是所謂的天然嘛，認為我們說是一定要實現祖國的統一，就是 kimoji 嘛，就是我們結束民族的悲慘歷史，……我現在回去跟我大學的朋友聊，如果台灣現在宣佈獨立，你們會不會支持政府去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說支持啊，台灣怎麼能獨立呢！不能讓它獨立啊，一定要收復台灣什麼的。還是能感覺到這個比例還是很高。(G0528)

有些陸生不一定能說出一整套完整的論述來解釋自己對統一的堅持，但往往將之歸因於從小接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建立在地圖上的國族想像：²⁰

（為什麼要統一？）我們受的教育啊，你看我們天天看的地圖都是有那個台灣島。集體的潛意識，這種東西像是深入骨髓吧，就是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是很嚮往一個大一統的這種東西的，這種大

²⁰ 地圖在國族想像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可參見 Anderson (1991) 的經典名著，尤其第十章。許多陸生都不約而同提到地圖對他們想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重要性。

一統下，訓練出來的，跟天天看這個地圖很有關係，從小學地理，這裡有一個地方。(K0528)

對於台獨我就接受不了，很小的時候我一直跟著我外公外婆長大，他是幾十年非常非常資深的黨員，我外公姓黃，他在教我寫黃字的時候就會說我們炎黃子孫之類的，每天回家就是拿放大鏡跟我外公一起看中國地圖，到三年級的時候，每個省的簡稱啊，省會啊，名字是怎麼來的啊，就已經弄得滾瓜爛熟了。就是小時候灌輸的這些東西，會影響我現在的選擇。(T0519)

2. 效應二：拉力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國族經驗也對少部分的陸生產生了「拉力」。換句話說，他們在台灣求學與生活的經驗拉近了他們與本地社會在國族問題上的距離，變得更加理解台灣的國族處境，甚至願意支持台獨。²¹ 雖然這些人相對來說是少數，但相較於「推力」的理所當然，這種「拉力」如何產生，格外需要解釋。在此，能否跳脫原有的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成了這種拉力是否能夠產生作用的重要因素。

簡單地說，他們在台灣所遭受到的制度排除與差別對待，比起其他陸生並沒有更少，有些甚至更多，²² 但這些經歷並沒有讓他們退回

²¹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說的「支持台獨」，指的並不是改變認同，希望自己成為台灣人，而是說，在繼續維持中國人認同的情形下，願意接受或支持台灣爭取獨立。另外還有一種極端的情形，是一方面理解並支持台獨，一方面則是對中國產生嫌惡感，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對中國認同的內容產生根本的懷疑。

²² 如下所述，有些陸生因為認同本土理念、積極參與社運，但他們在參與過程中遭遇到「台派」人士的冷嘲熱諷與排斥奚落，比起未曾參與過這些活動

到原先所接受的民族主義框架來自我防衛、或是退縮到較為舒適的「同溫層」抱團取暖，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們能夠克服自己原先的情感結構，跳脫既有的認識框架，從而採取本地人的角度來換位思考。換言之，如果愛國主義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世界觀是一種「自然態度」的話，那麼這些人比較能夠採取一種「擬現象學的態度」，跳脫原來的框架來思考問題。

從原來的自然態度中跳脫出來，並不見得就能理解另外一種自然態度。在我們的訪談中，發現至少兩種不同的途徑，曾經幫助陸生理解本地人的想法。其中一種是透過參與社運，積極理解台灣的處境，另一種則是透過歷史知識脈絡的補齊與自我反思，從而進一步理解本地人的想法。

大概可能還是從我開始接觸社運圈的朋友開始。因為這批人都是本土立場居多，自然而然就會有理解他們的立場，我覺得這種都是潛移默化的去理解的，就比如說辦完一場活動，收拾完東西大家去吃一個熱炒啊，喝個酒啊，然後大家就會聊這些問題。我也是聽了很多的講座吧，比如說那些慕哲啊什麼之類的，經常辦一些這樣的活動，那就好奇啊就去聽這些人，他們怎麼認知台灣，怎麼看待自己。(D0522)

陸生積極參與台灣本地的社會運動，有時也有助於本地生與陸生之間解開心結，促進和解：

的一般陸生，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陸生當中嘗有戲言，說這些人是「台灣虐我千百遍，我對台灣如初戀」。

我們班上有一個很台派的學生……那個男生真的很不喜歡我，老師只要讓我回答問題或者我回答問題，或者有什麼事情牽連到我，他就會起來噓。我一直不懂他為什麼不喜歡我，後來覺得可能因為我是大陸人吧……而且平日裡如果見到，很不友好，瞪著我，側著搶到我前面去把我擠開，上課在我講完之後直接舉手，不管老師有沒有要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都回噓我剛才說的話。一直到2014年4月的時候，蔡丁貴先生被帶走那一次，我們在立法院外面等他……然後我就睡在外面，結果我早晨起來一睜眼的時候，那個同學就坐在我旁邊……那時候我還躺在地上，就看見那個男生站在我旁邊對我90度鞠躬說：×××，對不起。嚇得我蹭一下就竄起來了，說你幹嘛？他說我顛覆了他對大陸人的看法。後來我們的關係起碼他不再抱有敵意了……那個心結起碼解開了。(B0317)

大部分的陸生在來台之前，對台灣的認識相當片面、甚至貧乏，但等到來到台灣，有機會接觸到大量資訊之後，其中一小部分的人，想法逐漸改變，原因在於他們對台灣社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補足了過去所不熟悉的歷史脈絡，對於某些政治主張或信念為何會出現，有了更進一步的掌握，甚至為之感動：

我剛剛跟男朋友在一起，他帶我去鄭南榕基金會，就那個時候第一次認識鄭南榕，認識那個時代發生的故事，他自焚的現場也有看到，很震撼的感覺。那天下午是就是**打開了我另外一個世界觀**，原來台灣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就有點像有一個脈絡被補起來吧。(D0522，黑體為筆者所加)

2011年，鳳凰網出一份專題，在談野百合，那個時候看了才了解當年這裡發生過什麼。說實話那個時候，讓我還蠻熱血沸騰的，就是那種感覺。後來有一次去參加民進黨搞的活動，當時看影片，放的是民視做的民進黨史，就是《台灣演義》，當下看那部片我會感覺到眼淚有要衝出來，就是早期的民主運動，黨外人士，包括民進黨想要去跟威權對抗，那種道德勇氣讓我感動，根基於這麼一個脈絡下的台獨運動，它是值得尊敬，至少對現在的我來講是這樣。(W0522)

在補足這些歷史脈絡、甚至為之感動的同時，他們也會較為積極地與大陸的朋友溝通，讓他們更為了解本地人的想法：

比如說去跟中國談台灣獨立這件事，我試過跟一個已經是蠻好的朋友聊，如果說我直接一開始就談台灣獨立這件事，他一定炸毛，但如果用一種比較迂迴的策略，從228開始講，從白色恐怖開始講，把那個脈絡補齊之後，他就能理解說，為什麼會有台灣獨立這件事，他當時沒有直接跳到支持這麼快，但是這麼一個迂迴的策略，包括說中共在兩岸關係還有包括它自己在內政上面的所作所為，把這些脈絡補齊之後，那個路程就會順利很多，雖然未必他會接受台灣獨立，至少他會覺得這是一個蠻可以理解，或者說蠻悲傷的事情。……因為我自己覺得，對於很多中國人，網路上也好，或者現實生活中也好，台灣獨立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高度抽象化，沒有脈絡，沒有歷史脈絡，沒有政治脈絡，就是台灣獨立，很多人很直覺想說，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獨立，如果把那些脈絡全部抽掉，確實台灣獨立是一個靶心，尤其是放在

中共民族主義的那個脈絡裡面，但是把這些脈絡加進去，它的合法性就慢慢長出來了。(W0522，黑體為筆者所加)

另外也有一些陸生，會比較積極地扮演橋樑的角色，甚至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做直播，「把信息搬到大陸去」(X0118)。

3. 「台灣效應」：兩種力量產生的三種類型

上面所說的「推力」與「拉力」，對陸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之稱為「台灣效應」。這種「台灣效應」將陸生分化出三種不同類型的群體，我們可以從圖 4 與表 4 來加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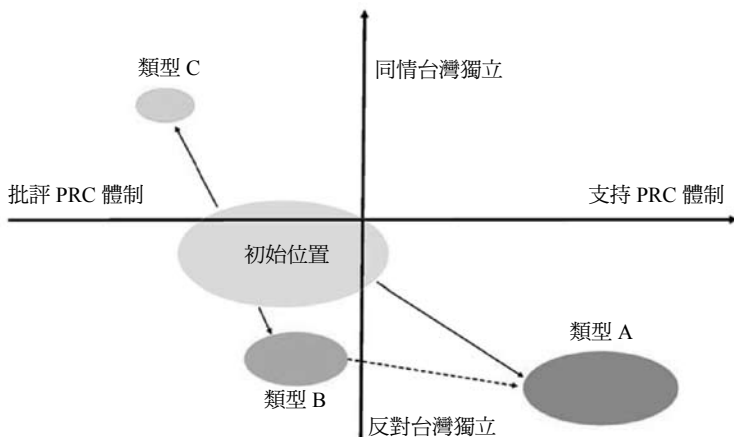


圖 4 陸生來台求學的「台灣效應」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4 以「是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體制」²³ 為橫軸，「支

²³ 這裡刻意不特別區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共體制」，並不是要提倡

持／同情台灣獨立」為縱軸，區分出四個象限。大部分的陸生在來台之前，基本上處於圖中以斜線標示的區域內。換句話說，除了少數的例外，陸生在來台之前基本上反對台獨，對中共政權與現行體制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滿乃至批判。來到台灣之後的國族經驗，使得他們在圖中座標的位置產生了顯著的變化。第一種變化，是因為推力而產生的類型 A，位處圖中的第四象限。他們對中共從批判轉為支持，立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之上的中國人認同更為增強，反台獨的立場也更為堅定。第二種變化則是類型 B，他們不像類型 A 那麼極端，基本上仍處於圖中第三象限的位置，但他們對中共政權／中國體制的批判較先前來得減弱一些，反台獨的立場則更加堅定——換言之，他們來台之後，更多地接受了中共的某些主張或立場（例如堅持統一、反對台獨），儘管他們基本上還是嚮往自由民主，對中共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多所批評。第三種變化，則是類型 C，他們對中共體制的不滿有增無減，對台獨的理解乃至支持程度，則明顯大幅增加。這三種類型的主要差異，可以從表 4 的綜合整理來加以理解。

表 4 「台灣效應」產生的三種類型及其對不同議題的基本態度

	類型 A	類型 B	類型 C
台灣獨立	×	×	√
中華民國象徵	×	√	△
台灣社運	×	△	√
中國民主化	×	√	√
武力統一台灣	√	△	×

說明：√ 表示傾向支持，× 表示傾向反對，△ 表示模稜兩可，視情況而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黨國一體」的意識形態，而是恰恰要反映出中共建國以來堅持一黨專政、以黨領政，造成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黨國難分」的客觀事實。

類型 A 可說是「支持現行（中共）體制型」，他們對台獨、中華民國、台灣的社運與中國民主化，基本上都保持反對或否定的態度，對於武力統一台灣，則傾向支持肯定。

類型 B 可說是「冀望民主／民國型」，他們對中華民國的象徵意涵（華人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的政體）基本上抱持肯定的態度，也支持中國民主化、反對台獨，但對於台灣的社會運動、以及武力統一這兩件事情，並沒有清楚一致的態度，因人而異。

類型 C 則是「同情台灣型」，這類人對台灣獨立有較多的同情式理解，甚至願意表達支持。他們支持台灣的社運，也支持中國的民主化，反對以武力統一台灣，但對於中華民國的制度與象徵，則沒有一致的立場，因人而異。就像台灣社會內部對此也缺乏共識，有些人認為台灣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國號就是中華民國，有些人則認為中華民國正是獨立的障礙，必須去除。

這三種類型可說是韋伯式的理念型，在現實中，我們可能發現具體的個案並不完全符應這三種類型，或是擺盪於兩種類型之間（最常見的是游移在 A 與 B 之間，或是從 B 過渡到 A），但這樣的分類，至少讓我們能夠較為清楚地掌握「台灣效應」所產生的可能結果。陸生並非高度同質的鐵板一塊，彼此之間其實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性，人際關係與團體互動也因此受到影響。相對於其他類型而言，類型 C 的陸生顯得稀少，與其他類型（尤其類型 A）之間較少交流互動，有時甚至會相互齟齬。

另外，根據我們的訪談資料與日常生活觀察，並不是所有的陸生都對國族問題感到興趣，有些則是保持較為實用主義的心態，刻意於國族問題保持距離，也不輕易表露他們對國族問題的看法。

五、結語：對和平與和解的啟示

本文強調，陸生在台的國族經驗，不能僅僅從「群體間互動」或「跨文化溝通」的角度來加以探討，而必須從「相互對撞的民族主義」來加以理解，才能進一步掌握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本研究採取現象學的取徑，從制度、情感結構與認知框架三個層次來解析陸生在台的國族經驗，主要發現可綜述如下。

首先，兩岸不同的國族制度，培養出兩種不同的「國民」。他們對國族的象徵符號、歷史記憶乃至對當下現實的理解，不僅存在著巨大分歧，而且是相互衝突的。相對於台灣接受本土化與民主化洗禮的「天然獨」世代，以 80 後與 90 後為主要構成世代的陸生，在中國大陸接受了改革開放之後不斷強化的愛國主義教育，可說是「天然統」的世代。陸生來到台灣，一開始固然有新鮮感或解放感，但也因為與本地人／本地生之間對現實認知的巨大差距，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經歷了不少震撼與衝擊。這些震撼與衝擊，不完全反映在與政治相關的事物上，而是廣泛地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

其次，在認識框架方面，「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台灣／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是無法相容的兩種認識框架，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內地」等用語，讓陸生覺得無所適從。在國族問題上，「戰爭之框」仍形塑兩岸許多人的看法，台灣將對方視為敵國，造成對陸生的敵意與制度排除，而多數陸生則相信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現實主義，認為兩岸終需一戰。

在情感結構上，陸生經常成為台灣人發洩怨恨與報復衝動的對象。大部分的陸生並不認為自己虧欠台灣什麼，更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因此對於台灣人民對他們的敵意與怒氣，覺得不可理喻，無

法接受。這也加深了彼此的嫌隙與惡感。除了少部分的例外，大部分的陸生對於北京打壓台灣帶給本地人的切膚之痛，缺乏「感同身受」的同情式理解。即使有些陸生比較能夠體察局勢，理解這種怒氣的來源，仍會覺得自己是「代國受過」，是無辜的替罪羔羊。

最後，陸生的國族經驗形成了某種「台灣效應」，分化出三種類型的陸生。這三種類型中，對台灣較為友善、較能同情理解台灣處境的「類型 C」算是少數，另外兩種類型則朝向「更加反對台獨」與「更加支持現有體制」的方向移動，儘管程度有所不同。

上面的分析使我們發現，當初希望陸生來台可以增進相互理解、和緩兩岸緊張關係的期待，似乎過於樂觀；更糟的是，我們發現，不少陸生來台之後對台灣的敵意或反感不減反增，而這種傾向（類型 A 與類型 B）的陸生所佔比例不小。

從促進和平與和解的角度來看，要降低敵意、化解衝突，必須從調整制度、跳脫認識框架、克服情感結構三個層次來著手，前者屬於外在途徑，後兩種則屬於內在途徑。由於兩岸的政治體制迥異，雙方政府各有盤算，因此要從外部途徑來改變現有的制度，是一件難度甚高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非政府的日常生活層面，兩岸之間可以嘗試從 Jeffrey Alexander (2006) 所提倡的「民間修復」(civil repair) 開始。

然而，要談民間修復，恐怕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如果雙方的民間都是以民族主義的自然態度來交往互動，也未必能夠達到相互理解（乃至和解）的目標，甚至如本文的分析所示，反而導致敵意的升高。在此，我們發現（擬）現象學態度的重要性。我們的分析指出，陸生來台能夠產生「拉力」，關鍵還是在於這些陸生能夠跳脫原來的認識框架，克服情感結構，而非回到熟悉的同溫層去抱團取暖。有位

陸生用「重開機」或「系統重灌」來打比方。筆者曾問一位陸生，既然來到台灣幫助他理解台獨的理念，為什麼他反而越來越往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靠攏，覺得兩岸非統一不可？為什麼他無法跳脫原來的框架來看事情？這位陸生的回答是：

那樣太累了。你知道嗎？那就像電腦重新開機一樣，整個系統要重灌，那對我來說，等於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來過一遍，那樣太累了。(Z0527)

這個比喻雖然不見得完全貼切，卻相當傳神。跳脫原來習慣的思考框架來看待周遭世界，重新建立新的世界觀，等於給自己的腦袋換一套新的作業系統，這必然不會是一個平順的過程，必須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大部分的人只想留在自己熟悉的世界裡，用讓自己感到最舒服的自然態度來面對生活即可。可惜的是，自然態度往往無法解決日常生活的許多問題，尤其在兩岸問題上，民族主義的對撞已經「日常生活化」，不再只是政治層面的事務而已。如果「重開機／重灌系統」有助於增進彼此理解的話，那麼需要「重開機／重灌系統」的不僅只是陸生，而是兩岸的人民。陸生在台灣的國族經驗所帶來的效應，值得我們留意。如果我們能夠從本文的分析當中提取一些有用的教訓，或許陸生的國族經驗，也能為兩岸和解帶來新的啟發。

【附錄】

有關「現象學的社會學」的概念釐清、 理論貢獻與方法論說明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現象學的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下文為行文簡便，有時稱「現象學社會學」），就其一般所理解的意義來說，泛指有意識地將現象學的概念或方法，帶入對社會生活及相關現象的考察的社會學研究。這裡牽涉到一個相當根本的問題：什麼是現象學？一般而言，現象學被理解為一種由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於 20 世紀初所開創的思想學說或理論流派，企圖透過對意識的考察來證成哲學成為一門嚴密的科學。然而，如果稍加探究，我們將會發現，現象學其實是一個由集體心智所共同創造累積的知識運動，每一位提倡者所提出的見解與學說相當多元歧異，甚至相互扞格。換句話說，現象學並非胡塞爾所專屬，也不是以他的說法為唯一依歸。²⁴ Herbert Spiegelberg 在其知名的《現象學運動》（*The Phenomenological*

²⁴ Dermot Moran 便指出，胡塞爾到了 1931 年甚至宣稱自己是現象學運動的「頭號公敵」，因為現象學運動包含的不只是胡塞爾的作品，還涵蓋了許多具有原創性的現象學實踐者，他們的主張與胡塞爾大相徑庭，其中最知名的便是謝勒與海德格。Moran 進一步引用里克爾（Paul Ricoeur）的說法，指出現象學無非是一連串從胡塞爾脫逸的過程，現象學的歷史即是胡塞爾的異端史（Moran, 2000: 2-3）。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982) 一書中，便提出兩個標準來判定現象學運動所包含的範圍：(1) 必須或隱或顯地採用兩種方法：(a) 以直接直觀（先不管它的意義是什麼）作為知識的來源及最終檢驗判準，(b) 對本質結構的洞察，將之視為哲學知識的真正可能性及必要條件；(2) 充分意識到上述方法的原則，有意識地堅持現象學運動（Spiegelberg, 1982: 5-6）。我們下面將會討論到，現象學的社會學的幾位核心人物，對現象學的主張都不完全與胡塞爾一致——尤其謝勒，胡塞爾曾稱其為自己的「對蹠者」（antipode）——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是公認的現象學家。因此，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最好先釐清所根據的是誰所提倡的、什麼樣的現象學，更不能因為討論的對象不是根據胡塞爾的著作而來、或是與胡塞爾的看法不同，便認為那不是現象學。²⁵

在現象學的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有幾位核心人物。第一位是謝勒（Max Scheler），他同時是現象學家、也是社會學家。在胡塞爾推動現象學運動的當時，謝勒曾被認為是現象學的第二把交椅，重要性不亞於胡塞爾。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才華橫溢且廣為人知的社會學

²⁵ 另外一個根本問題，在於「現象學的社會學」所涵蓋的範圍，是否僅限定在「應用現象學的方法來從事社會學研究」。這牽涉到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史上的一段公案，也就是現象學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本文對此暫不深究，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Tiryakian（1965）、Heap and Roth（1973）、Srubar（1984）等。簡單地說，筆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是，社會學由於具有高度自我反思的性格，因此在許多方面與現象學有相互呼應之處，但如果把大部分的社會學（包含馬克思、韋伯、涂爾幹、齊美爾等所謂「古典理論」）都理解為帶有現象學意味的社會學，將使「現象學的社會學」這個詞彙失去意義。因此，本文必須特別強調，唯有「有意識地使用現象學的概念或方法來從事社會學研究」，才稱得上是「現象學的社會學」。至於「現象學的社會學」本身能不能算是現象學的一種，這再度牽涉到定義與範疇界定的問題，此處暫不討論。

家。由於這樣的身分，他並沒有刻意要將現象學帶入社會學當中，而是悠遊於兩者之間，自然而然地在其著作中將兩者糅合。例如他受到推崇且影響深遠的著作《道德建構中的怨恨》(*Ressentiment*) (Scheler, 1998)，便同時採取現象學與社會學的分析，一方面對怨恨的情緒做了層層深入的現象學剖析，另一方面又對怨恨的社會學起源做了精闢的探討。對謝勒來說，現象學與社會學似乎是兩個相關但卻又不同的學門領域，他並沒有急切地想要把前者帶入後者當中，或是將兩者結為一體，發展出「現象學的社會學」——儘管後世的詮釋者傾向於使用這樣的名詞（參見 Stickers, 1980）。此外，他的許多現象學著作，例如對主體間性的分析、對同情與擬情作用的考察、以及上述對怨恨的研究，對於社會學研究者都有極大的啟發，成為現象學的社會學重要的理論源頭。

現象學的社會學的第二位核心人物，則是舒茲 (Alfred Schutz)。舒茲同時受到胡塞爾與謝勒的影響，和謝勒相同，也橫跨哲學與社會學兩個領域，在兩個領域中都受到推崇。但和謝勒不同的是，舒茲十分有意識地要將現象學帶入社會科學當中，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許是舒茲為了躲避納粹流亡到美國，他所面對的美國社會學界，對現象學的理论傳統並不熟悉，因此他必須花許多心力，介紹並推廣現象學的概念與方法。Schutz 的許多著作，包括《社會世界的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1967)、《社會現實問題》(*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1962)，都是將現象學的概念與分析方式帶入社會學研究的代表著作，也啟發了美國社會學界對現象學的興趣。

如果說，謝勒是現象學的社會學的先驅者，舒茲是現象學的社會學的奠基者，那麼，Peter L. Berger 及 Thomas Luckmann 兩人可說

是現象學社會學的推廣者。他們兩人合著的《現實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1967)一書,到現在仍是社會學理論課堂上必讀的經典之作,也是理解「現象學的社會學」重要的入門書,可說是當前流行的「社會建構論」的開山祖師。

為了避免誤解,本文所稱的「現象學的社會學」,主要指的是上述四位學者的著作,而他們的概念與方法,也是本文主要的立論根據。此外,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現象學與社會學,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無論就起源、性質、目的來說,都顯著不同。因此,本文的理論定位與對話對象,主要還是在現象學的社會學,而非哲學領域的現象學(尤其胡塞爾的現象學)。然而,現象學的社會學畢竟是受到現象學的啟發與影響而來,因此,現象學的社會學還是借用甚至是挪用了許多現象學裡面的概念方法。其中,還原(reduction)、擱置(epoché,或稱「放入括弧」[bracketing])、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及現象學的態度(phenomenological attitude),是影響本研究較多的幾個概念,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說明。

在現象學的社會學中,有兩種擱置的概念。一種是被研究者的擱置,另一種則是研究者的擱置。在一般常民的生活世界中,人們對於周遭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這種擱置,等於是把懷疑放入括弧,不加思考反省,舒茲將這種擱置稱為「自然態度的擱置」(epoché of natural attitude)。自然態度的擱置與現象學的擱置正好相反:現象學是把所有一切理所當然的事物都放入括弧,存而不論,而自然態度的擱置,則是把懷疑束之高閣,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現象學的社會學的第二種擱置,是研究者的擱置。研究者要探究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與自然態度,必須採取一種客觀而不涉入

的中立 (disinterested) 態度，因此，他也必須將他自己的自然態度放入括弧之中，不對被研究的對象和事物形成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這種擱置，Berger and Luckmann 直接就稱之為現象學的括弧 (phenomenological bracket)。不過，在舒茲的著作中，並沒有使用這樣的名詞，只說這是一種科學態度的擱置 (Schutz, 1962: 249)。畢竟這種擱置，和胡賽爾所說、將所有一切經驗現象都放入括弧的現象學擱置，是不一樣的。

與此相關的，是「現象學態度」。與「自然態度」相對，現象學態度強調的是一種反思的態度，避免附和素樸的信念，不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Spiegelberg, 1982: 742)。謝勒認為，現象學與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種態度，一種觀看世界的態度 (Scheler, 1973: 137)。謝勒區分出三種態度，對應到三種事實。第一種是自然態度所對應的自然的事實，這是日常生活不假思索、無需反省的經驗，例如：不論托勒密或哥白尼怎麼說，人們每天都經歷到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的事實。第二種態度是科學的態度，對應的是科學的事實。科學的事實不是自然的，而是人工的，經過「科學的還原」從自然事實中所獲取、並透過符號加以抽象化、普遍化、理想化所建立的事實。第三種態度則是現象學態度，揭露的是現象學的事實。對謝勒來說，這種態度需要心靈技藝 (psychic technique)，透過立即的直觀掌握純粹事實，讓人得以洞察事物的本質 (Stickers, 1980: 9; Scheler, 1973: 202)。現象學是一個永恆的「去符號化」(desymbolization) 的過程，因為現象學不接受自然態度的自然事實，也不接受科學透過符號所建立的科學事實，而是企圖擺脫符號、回歸到事物本身，也因此，謝勒認為現象學是一種可以引發我們改造世界觀的強大工具

(Spiegelberg, 1982: 278)。²⁶

正因為現象學是一種可以改造世界觀的強大工具，現象學（的社會學）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來說，格外有其適切性與必要性，而這也是本研究能夠有所貢獻於民族主義理論的地方。當今我們所生存的現代社會，可說是一個又由眾多民族國家所建構而成的國族現實（nationalist reality, Wang, 2004）。18世紀後半以來，民族主義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席捲全球，直到今日，民族國家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單位，「國族」作為一個分類的實踐範疇（category of practice），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國族主義也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組成原則，為人們每日踐履，學界以「凡常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稱之（Billig, 1995; Skey and Antonsich eds., 2017）。用現象學的概念來說，（凡常）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素樸的世界觀，構成了一種「自然態度」。為了深入理解這種已經變成自然態度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必須採取一種「現象學態度」，不對特定的民族主義做出價值判斷，也不認為民族主義是「虛假意識」。現象學分析的目的既不是嘗試駁斥、也不是要解構民族主義。毋寧說，這樣的研究取徑是要如其所如地還原：民族主義如何認識事物、從民族主義內部所看出來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更具體地說，現象學的方法呼應了Bonikowski（2016）的籲求，有助於我們探討民族主義背後的認知、情感與論述範疇，如何形塑並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²⁷

²⁶ 謝勒曾經以「紅」為例，說明自然態度、科學態度以及現象學態度如何理解「紅」這個現象，一步一步提示了現象學態度如何透過還原與直觀來掌握紅的本質（Scheler, 1973: 137-151），由於內容較為複雜冗長，此處不再贅述。

²⁷ 事實上，現象學不應當僅只被理解為一種限縮在哲學或少數特定圈子的知識流派，而應該被視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運動。除了此處所提到的現象學

根據現象學所提示的原則與方法，筆者嘗試將「民族主義」這種現象，透過下面的步驟加以還原：²⁸

首先，我們將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所有事物加以擱置（包括統獨立場、民族主義的信念、象徵符號、國家認同等），不去判斷民族主義的主張是對或錯、不去評價民族主義的宣稱是真實的或是虛假的，甚至不預設「國族」（nation，無論是「台灣」還是「中國」）的本體論實存（ontological existence）。在經過這番擱置後，我們將會發現，「國族」這個東西並沒有本質性的存在。人們之所以感受到國族的存在，是因為制度的運作（國旗／國歌／國號、政府組織、法令規章〔包含憲法〕等），使得人們將「國族」這個東西實體化了。制度使得人們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將事物加以分類及類型化，把建構出來的東西實體化、本質化，這是現象學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也是常見的分

社會學與民族主義研究外，現象學的方法可被應用在生活世界中各種事物的探究與反思。許多知名的理論家與思想家，例如海德格、沙特、德希達、里克爾乃至近年來頗受重視的漢娜鄂蘭，都深受現象學影響，本身也都可算是現象學家（Moran, 2000）。

²⁸ 挑剔的讀者可能會質疑：筆者這裡所說的「還原」不是胡塞爾所界定的現象學意義下的還原（無論是「本質還原」、「現象學還原」或「超驗的還原」），因為胡塞爾現象學還原的操作主要運用在意識的內省、而不是運用在經驗現象或研究對象上。這樣的說法或許沒有錯，但筆者要再度強調的是，本文所依循的是謝勒的現象學，而不是胡塞爾的；後者所戮力追求的超驗現象學，為前者所不取。退一步說，即使是胡塞爾所提倡的現象學方法，也的確可以應用在經驗世界的社會學探究上，而這正是舒茲努力介引胡塞爾的學說到社會科學時所追求的目標（參見 Schutz, 1962: esp. 99-149）。此外，本身也是現象學運動健將的 Herbert Spiegelberg 在介紹胡塞爾的學說時，特別提到了「哲學的還原」（philosophical reduction），意指採取一種中立的態度來面對過去的哲學（Spiegelberg, 1982: 752）。換言之，無論是追隨謝勒還是胡塞爾，還原／擱置作為一種方法，的確可以應用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事物上，並非只能限定在「純粹科學」或內心意識的考察。

析（尤其在所謂「制度論」的研究裡）。因此，我們將制度放在第一層。在這個層次上，我們處理的是「國族」的本體論問題。

然而，僅僅分析制度，我們便得到民族主義這個現象的本質核心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們把制度也加以擱置，那麼我們將得到什麼？就以本文的案例來說，如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放入括弧，假設兩岸之間沒有制度上的差異，如果陸生來台沒有遭受制度性的歧視與排除，那麼，在他們的國族經驗中，起作用的是什麼？此時，我們發現了「認識框架」。這個認識框架不是先天給定的，而是透過人們所處社會的同時代人與前時代人所形塑（Schutz, 1967: 176-214; 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173-180）。²⁹ 在此，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中國有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勝利的歷史，台灣則是被日本殖民，有二二八的傷痕與「反共」的集體記憶，這兩個社會的人們定義自己的過去與現在的框架是十分不同的，界定彼此關係的框架也是截然迥異的。因此，現象學還原的第二層，是認識框架。在這個層次上，我們處理的是民族主義的認識論問題。

但是，認識框架，已經是民族主義這個現象的本質核心了嗎？恐怕還不是。民族主義最極端的表現形式，不在於人們如何透過認識框架來建立自我認同，也不在於經過理性算計來選擇國族，而在於人們願意為國族獻身，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辭。對一個人來說，他／她所能夠擁有的最終之物，就是自己的生命；而當一個人為了國族願意付出他所能付出的最高代價，意味著國族具有比起個人生命更

²⁹ Schutz 此處分析同時代人與前時代人如何形塑人們對現實的類型化建構，而 Berger and Luckmann 則是討論歷史對認同的影響。他們並未使用「框架」的概念，但 Goffman (1974) 根據他們的現象學社會學，發展出「框架」的概念。

為崇高的價值。換言之，民族主義涉及終極價值判斷，國族的價值比起個人的生命來得更重要，因此為了國族的存在，個人的存在可以犧牲。而價值體系的建立與價值判斷，則牽涉到人的情感——在這點上，我們從謝勒對價值與情感的現象學分析中得到啟發（Scheler, 1998）。回到我們所關心的兩岸民族主義問題上面來說，許多台灣民族主義者，誓言打死不願意做中國人。舉例來說，陳芳明在〈我的遺言〉這首詩中寫道：「葬我的頭骸在新高山的峯巔，背向亞細亞大陸。」新高山是日本人給玉山取的名字，他寧可擁抱日本殖民者也不願面對亞細亞大陸上的中國，即使死後也執意要「背向亞細亞大陸」，可見其內心對中國的極度嫌惡。同樣地，在過去的研究中，筆者發現，許多中國大陸的民眾（包括本文所討論的陸生）都表示，就算在理智上了解為什麼台灣人想追求獨立，但是在情感上就是無法接受台灣獨立。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的最核心，是一個情感的問題。就算理智上了解（認知框架調整了），情感上也無法接受。這一點，呼應了謝勒所強調的情感先天性（*emotive a priori*），也就是人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價值判斷是先從情感來的，價值體系是受到情感所決定的，而這個「情感先天性」是一個已經無法再還原的東西。因此，我們將情感擺在最核心的位置。在這個層次，我們考察的是民族主義的倫理學問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Vanessa

- 2015 〈要當兩岸交流的橋樑，就要做好被踩在腳下的準備（上）〉，貌似實驗室，查詢日期：2016年8月17日。
http://www.mouse-lab.com/2015/04/26/the_price_of_being_the_bridge_1/

Vanessa

- 2015 “yao dang liang an jiao liou de ciao liang jiou yao zuo hao bei cai zai jiao sia de jhun bei (shang).” Mouse-lab. Available at http://www.mouse-lab.com/2015/04/26/the_price_of_being_the_bridge_1/

丁一

- 2015 〈台灣，你何時睜眼看看世界？〉，《旺報——中時電子報》，D4版，6月3日。

Ding, Yi

- 2015 “Taiwan ni he shih jheng yan kan kan shih jie?” *Chinatimes.com*, D4, June 3.

王嘉州

- 2011 〈來臺陸生的政治態度與臺灣主權接受程度〉，《台灣政治學刊》，15卷2期，頁67-113。
- 2012 〈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9卷3期，頁85-118。

airiti
Wang, Chia-Chou

- 2011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n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ese Sovereignty by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2): 67-113.
- 2012 “A Pilot Study on Attitude Change toward Unifi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9(3): 85-118.

行政院

- 2010 〈陸生三法修正草案三讀通過〉，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查詢日期：2017年5月15日。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2EE62F1CA39687D9

Executive Yuan

- 2010 “lu sheng san fa siou jheng cao an san dou tong guo.” Central Taiwan Joint Service Center, Executive Yuan. Available at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2EE62F1CA39687D9

吳介民

- 2009 〈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11期，頁141-157。

Wu, Jieh-Min

- 2009 “China yin su yu Taiwan min jhu,” *Reflexion* 11: 141-157.

李佩雯

- 2014 〈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

究》，《傳播研究與實踐》，4卷1期，頁129-171。

Lee, Pei-Wen

2014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An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 between Mainland Students and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1): 129-171.

李明賢

2011 〈馬：五都選舉 讓陸生動容落淚〉，《聯合報》，A23版，1月7日。

Li, Ming-Sian

2011 “Ma: wu dou syuan jyu rang lu sheng dong rong luo lei,” *United Daily News*, A23, January 7.

李淑華

2011 〈陸生來台 總統：有助兩岸和平〉，中央社，查詢日期：2017年5月15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104130048-1.aspx>

Li, Shu-Hua

2011 “lu sheng lai tai zong tong you jhu liang an han ping.” Central News Agency. Available at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104130048-1.aspx>

汪宏倫

2001 〈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1期，頁183-239。

2010 〈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

- 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19期，頁147-202。
- 2012 〈淺論兩岸國族問題中的情感結構：一種對話的嘗試〉，收錄於徐斯儉、曾國祥等編，《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新北：左岸文化，頁181-231。
- 2014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收錄於汪宏倫等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頁157-225。
- 2016 〈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收錄於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頁371-436。

Wang, Horng-Luen

- 2001 “Institutional Contexts,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aiwan’s National Question,” *Taiwanese Sociology* 1: 183-239.
- 2010 “From *On War* to the *New History Textbook*: *Ressentiment*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Nationalism,” *Taiwanese Sociology* 19: 147-202.
- 2012 “*cian lun liang an guo zu wun ti jhong de cing gan jie gou: yi jhong duei hua de chang shih*,” in Szu-Chien Hsu and Roy Kuo-Shiang Tseng et al. eds., *Civility and Peace Dialogue*. New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pp. 181-231.
- 2014 “*dong ya de jhan jheng jhieh kuang yu guo zu wun ti: duei Japen, China, Taiwan de kao cha*,” in Horng-Luen Wang et

al. eds., *jhan jheng yu she huei li lun li shih jhu ti jing ya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pp. 157-225.

- 2016 “li jie dang dai jhong guo min zu jhu yi: jhih du, cing gan jie gou yu ren shih kuang jia,” in A-Chin Hsiau and Horng-Luen Wang eds., *zu cyun, min zu yu sian dai guo jia: jing yan yu li lun de fan sih*.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pp. 371-436.

林弘展

- 2015 〈給台大政研所陸生學弟的一封信〉，《蘋果日報》，查詢日期：2015年12月26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207/748197/

Lin, Hong-Jhan

- 2015 “gei tai da jheng yan suo lu sheng syue di de yi fong sin,” *Appledaily*. Available at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207/748197/>

胡俊鋒

- 2013 《三「國」演義：來臺陸生的多元「中國」身份》。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 《臺灣不是我的家：陸生在臺的認同衝擊》。台北：獨立作家。

Hu, Jun-Feng

- 2013 *Chinese Overseas or Oversea Chinese: The Multi-identity of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in Taiwa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4 *Taiwan bu shih wo de jia: lu sheng zai tai de ren tong chong*

ji. Taipei: Independent Writer.

胡紹嘉

- 2012 〈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111 期，頁 43-87。

Hu, Shao-Chia

- 2012 “Reflections on Journeying to Taiwan: A PRC Student’s Intercultural Narrative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1: 43-87.

馬軍

- 2012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只是過客〉，中國台灣網。查詢日期：2015 年 10 月 17 日。http://big5.taiwan.cn/twrwk/ywys/201210/t20121026_3228616.htm

Ma, Jyun

- 2012 “Taipei bu shih wo de jia wo jhieh shih guo ke.” www.taiwan.cn. Available at http://big5.taiwan.cn/twrwk/ywys/201210/t20121026_3228616.htm

張逸帆

- 2015 〈你們的健保很好，但我從未向你們乞討〉，ETtoday 新聞雲，查詢日期：2015 年 12 月 4 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29/605100.htm

Jhang, Yi-Fan

- 2015 “ni men de jian bao hen hao dan wo cong wei siang ni men ci tao.” ETtoday. 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29/605100.htm

章廉

- 2013 〈請不要炫耀你對大陸的無知〉,《旺報——中時電子報》, C4 版, 9月6日。

Jhang, Lian

- 2013 “cing bu yao syuan yao ni duei da lu de wu jihih,” *Chinatimes.com*, C4, September 6.

黃光國

- 2012 〈序言——建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動力〉,收錄於楊景堯編,《大陸學生台灣夢》。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頁 vi-ix。

Hwang, Kwang-Kuo

- 2012 “syu yan—jian gou ru jia ren wun jhu yi de siao shu chuan tong liang an guan si liang sing fa jhan de dong,” in Ching-Yao Yang ed., *da lu syue sheng Taiwan meng*. Taipei: Consortium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pp. vi-ix.

黃碧端

- 2013 〈序言〉,收錄於楊景堯編,《大陸學生台灣緣：陸生的台灣成長記憶》。高雄：麗文文化,頁 i-ii。

Huang, Pi-Twan

- 2013 “syu yan,” in Ching-Yao Yang ed., *da lu syue sheng Taiwan yuan: lu sheng de Taiwan cheng jhang ji yi*. Kaohsiung: Li Wen Publishers Co., Ltd., pp. i-ii.

楊景堯

- 2015 《兩岸文教交流與思考 2012-2014》。高雄：麗文文化。

Yang, Ching-Yao

2015 *liang an wun jiao jiao liou yu sih kao*. Kaohsiung: Li Wen Publishers Co., Ltd.

楊森

2015 〈台灣，請用民主說服我〉，《蘋果日報》，查詢日期：2015年12月4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204/745769/

Yang, Sen

2015 “Taiwan, cing yong min jhu shuei fu wo,” *Appledaily*. Available at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204/745769/>

葉家興

2013 〈陸客太多，陸生太少〉，鉅亨網，查詢日期：2015年12月16日。http://blog.cnyes.com/My/YehJason/article1085299

Ye, Jia-Sing

2013 “lu ke tai duo, lu sheng tai shao,” [www.cnyes.com](http://blog.cnyes.com/My/YehJason/article1085299). Available at <http://blog.cnyes.com/My/YehJason/article1085299>

葉家興等

2013 《陸生元年：木馬屠城？楚材晉用？》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Ye, Jia-Sing et al.

2013 *lu sheng yuan nian: mu ma tu cheng? chu cai jin yong?*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外文部分

Alexander, Jeffrey C.

2006 *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Bonikowski, Bart

2016 “Nationalism in Settle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1): 427-449.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s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udith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Chen, Chih-Jou Jay

2017 “Inspirations from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cademic Visitors in Taiwan,” in Steve Tsang ed., *Taiwan’s Impact on China: Why Soft Power Matters More than*

Economic or Political Inputs. Oxford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69-94.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John A. and Siniša Malešević

2013 *Nationalism and Wa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ap, James L. and Phillip A. Roth

1973 "O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3): 354-367.

Moran, Dermot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Scheler, Max

1973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Schubert, Gunter ed.

2016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key, Michael and Marco Antonsich eds.

2017 *Everyday Nationhood: Theorising Cultur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fter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piegelberg, Herbert

1982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Hague: Nijhoff.

Srubar, Ilja

1984 "On the Origin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Human Studies* 7(2): 163-189.

Stickers, Kenneth W.

1980 "Introduction," in Max Scheler ed., *Problem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 pp. 1-30.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Tiryakian, Edward A.

1965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5): 674-688.

Wang, Chia-Chou

- 2016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Trust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4): 527-544.

Wang, Chia-Chou and Jesse Yu-Chen Lan

- 2016 “A Panel Study of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es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Asian Survey* 56(5): 958-981.

Wang, Horng-Luen

- 2004 “Mind the Gap: On Post-National Idea(L)S and the Nationalist Reality,” in Allen Chu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Issu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pp. 24-36.

Weber, Max

- 195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mmer, Andreas

- 2013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bstract

In 2011,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new policy to open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lso known as “*lusheng*”)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degrees in Taiwan. Many high officials and supporters optimistically expected that such a policy would adv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some may even have thought that this policy would foster “Taiwan-friendly circles” that, in turn, would contribute to peace-building by reducing tensions across the Strait.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mainland student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national question” through three levels: institutions, cognitive frames, and structures of feeling. It is found that “national experiences” of mainland students generate both “pushes” and “pulls” that further differentiate three types of students. Among them, two types of students have become more hostile to Taiwan and more supportive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Such a result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initial policy expectation. In conclusion, we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is analysis for futur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Strait.

Keywords: lusheng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banal nationalism, everyday life, cross-strait relations,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Long Summary

In 2011,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new policy to open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³⁰ (also known as “*lusheng*”)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degrees in Taiwan. This policy stemmed from two backgrounds: the one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ncoming students resulting from the low birth rat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Taiwan; the other was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promoting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any high officials and supporters optimistically expected that such a policy would adv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some may even have posited that this policy would cultivate “Taiwan-friendly circles” that, in turn, would contribute to peace-building by reducing cross-Strait tensions in the future. However, after a few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this policy did not seem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goal; on the contrary, many mainland students expressed strong antipathy towards Taiwan and become more nationalistic, to the extent that some characterized Taiwan as a “base of patriotic education” (*aiguo zhuyi jiaoyujidi*) of the PRC that helps to foster nationalistic Chinese citizens. In other words, they have become more patriotic and

³⁰ To refe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s “mainland” or “China” is not neutral; each term has different political conno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adopts, we suspend the judgments about these terms and use them interchangeably to reflect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re used.

nationalistic since they came to Taiwan. Why is that so, and how can we explain such a phenomenon? What experience have they undergone to become more patriotic? By examining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which refers to the experience pertaining to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of mainland stu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rior to 2011, there wer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stayed in Taiwan for only a short term. However,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students who formally enroll in the school and pursue a degree,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degree students.” Most previous studies on mainland student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exchange students, while the experience of degree students has remained largely unexplored. As this study will show, degree students’ experience has differed sharply from exchange students; even if some degree students had visited Taiwan as exchange students before they were formally enrolled, they admit that their experience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since they became a degree student.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mainland student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what is called “banal nationalism.” As nations and nation-states have become categories of practice that penetrate everyday life, nationalism has become “banal,” taken for granted in daily routines (Billig, 1995; Bonikowski, 2016).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two banal nationalisms have been fostered: Chinese nationalism, which regards Taiwan a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China, and ROC/Taiwan nationalism,

which sustains Taiwan as an autonomous community that is *de facto* independent of the PRC. These two nationalisms, with contradictory territorial claims and incongruent national imaginations, collide head on in micro-interactions in mainland students' daily life.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adopts originate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n three levels: institutions, cognitive frames, and structures of feeling. The methodological operation to obtain these three levels is provided in the Appendix. The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25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from daily interaction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and WeChat. We analyze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order of three phases: (1) the cultural shock of initial contact, (2)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exclusions, conflicting cognitive frames, and mutually hurt feelings, and (3) coping strategies and attitudinal adjustments.

First of all, most of these PRC students encountered a cultural shock when they first arrived in Taiwan.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most of them “crossed bord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fe—many insisted that they did not “go abroad,” because Taiwan was for them part of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y maintained that they simply crossed what they perceived as provincial borders but did not leave the country. Growing up under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PRC in the 1990s, these students “naturally” think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and Taiwanese people are “compatriots” who embrac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fication. Under

such an assumption, they came to Taiwan only to find that, to their great surprise (as well as disappointment), Taiwanese people were by no means “compatriots” who embraced unification as they had previously assumed. Instead, most Taiwanese people they encountered took Taiwan’s political autonomy for granted and regarded them as outsiders. Many students found themselves embarrassed when they unwittingly revealed their na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publicly. More often than not, their commonsense (about Taiwan) simply did not work in Taiwan; worse yet, such commonsense was ridiculed by Taiwanese surrounding them and incurred attack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Furthermore, after the cultural shock during the first encounter,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se mainland students was further worsened by institutional exclusions, mutually conflicting cognitive frames and hurt feelings. To begin with, mainland students were excluded from many institutional benefits that other students could enjoy. These exclusions are generally known as “three restrictions and six no’s:” the three restrictions include those on the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the PRC, the total amount of students, and the area of specialty being recognized, while the six no’s refers to no preferential consideration in grading, no impact on the enrollment of domestic students, no scholarship from the government, no part-time job, no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and no permit to take examinations for official posts or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In addition,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jo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lan because they were not regarded as citizens. These institutional

exclusions caused widespread bitter sentiments in mainland students, as they found themselves being treated as “second-class students” whose situation was even inferior to foreign students. In addition, mainland students encountered hostile treatment or even discrimination of various kinds in their daily life. For instance, some students faced verbal attacks from pro-independence professors who challenged their belief in “one China” in class; some were humiliated in person by their Taiwanese classmates when mainland students were deemed unqualified to discuss certain public issues because they came from an undemocratic country. Besides, since the PRC has been suppressing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n numerous occasions, some Taiwanese vented their resentful emotions against China upon these mainland students, who were regarded as surrogates of the PRC. The anti-China sentiments prevailing in Taiwan, especially during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2014, further hurt the feelings of mainland students, so much so that many admitted that they became more patriotic than ever and began to embrace Chinese nationalism even more.

Consequently,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mainland students generated what can be called “Taiwan Impacts” (vis-à-vis the so-called “China Impacts”) that consist of both “pushes” and “pulls.” In terms of pushe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mainland students pushed them further away from Taiwan and more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also generated some pulls to a number of students, who became more

sympathetic with Taiwan. The impacts of pushes and pulls further induced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and changing attitudes. Initially, mainland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less supportive of the PRC government before they came to Taiwan. Some of them were rather critical of the PRC government, putting their hope in the ROC government in Taiwan to “redeem” the future of China. However, as they stayed in Taiwan for some time, their attitude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hich, the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ype A were pushed away from Taiwan and far more towards the PRC government to subscribe to the official ideology. Their antipathy towards Taiwan independence became deeper, while their suppor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reinforced to a great extent. Type B resembles Type A in that their antipathy towards Taiwan independence became deeper, but they were not leaning towards the PRC government as much as Type A. Instead, they still tried to keep a critical distance from the PRC government, although such a distance may have shrunk 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y came. Finally, Type C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former two types in that they became more sympathetic to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more critical of the PRC government. While the three types are simply “ideal types,” there is a continuum between Type A and Type B. As time goes on, some may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ype B to Type A. The majority of our interviewees fell into these two types, while Type C, mostly excluded from mainland students’ circles, was rarely found.

To sum up, through examining institutional exclusions, contradictory

cognitive frames and conflicting structures of feelings, we find that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of mainland students tended to make them more hostile to Taiwan and more supportive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Such a result contradicts the initial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of policy makers and supporters. The implications suggest that reducing institutional exclusions, shifting cognitive frames and overcoming contradictory structures of feelings are the keys to tru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Strait.